

新高中歷史科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歷史課程知識增益：必修部分

二十世紀中國：現代化與蛻變的歷程

連浩銓博士

(香港大學歷史系名譽副教授)

2007年3月

第一講 清末新政與共和革命：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肇端 (1900—1911 年) (兼論現代化的史觀與史實)

(一) 緒論：現代化的史觀與史實

現代化與蛻變的闡釋

現代化(modernization)的結果是蛻變(transformation)，是一種根本上的(fundamental)轉變(change)。轉變在每一個歷史時期都普遍存在。而蛻變則是特定歷史時期(近世)的一個現象，不是每一個歷史時期都有。這是蛻變與轉變的分別。

現代化是 20 世紀中國歷史發展的主題。在這個時期，中國無論是政治制度，經濟組織，生產方式，社會結構，甚至個人的思維模式、行為方式等各方面，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20 世紀的中國，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現代化範式——即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和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的對峙和鬥爭。這個時期還出現了兩種現代化方式——改革和革命。

注意：教師在授課的時候，首要回答的問題是「何謂現代化？」

現代化理論與史觀的建構

「現代化」這一用語從新文化運動開始出現。當時的白話文翻譯，出現了一些與「現代化」相關的名詞，如：「西方化」、「電力化」、「機械化」、「時髦」、「摩登」等等。直到 20 世紀 50、60 年代「現代化」理論流行的時候，這個用語才廣泛地被提及和接受。

20 世紀 50、60 年代美國史學界「西方中心觀」(Western-centric approach)的興起：

此時被史學界認同，而且盛行一時的兩套相關史觀是：「衝擊－回應」史觀 (“*impact – response*” approach) 和「傳統－現代」史觀 (“*tradition – modernity*” approach)。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最先用「衝擊－回應」史觀來解釋中國近代史。他認為：近代中國回應西方的衝擊是失敗的。所謂失敗，即中國未能像日本那樣走上現代化的道路。

至於「傳統－現代」史觀，則直接受到當時美國社會科學界所盛行的「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影響。

20 世紀 50、60 年代美國社會科學界「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的現實意義和特色：

「現代化理論」，是社會科學領域的一種「發展理論」(*theory of development*)。此理論具有兩個現實意義：第一，為對抗共產主義的擴張提供一個學術綱領；第二，為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一個植根於一種「發展的意識形態」(*development ideology*)的發展藍圖，相信通過科學、理性、啓蒙，通過資本主義自由經濟、民主來建構一個安定、自由、幸福的世界。因此，「現代化理論」不只是一個學術性綱領，還帶有很強的政治意識形態意味。在這一時期，現代化理論的特色是：把人類社會的發展、演變劃分為「傳統」(*traditional*)和「現代」(*modern*)兩個不同的時期，並強調「傳統」與「現代」的對立和相互排斥。「傳統時期」被認為是停滯不前，一成不變的。而「現代時期」則是生機勃勃、經歷根本變革，並以歐洲啓蒙運動的理性觀點為依歸。傳統與現代的關係既然是相互排斥、對立，因此，若要實現現代化，必須徹底消滅傳統。

若以「現代化理論」來分析中國歷史，則可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傳統中國無法自發產生現代化，無法產生根本變化；

第二，中國需要受到外來的強烈刺激，才能產生根本的變化；

第三，只有受到啓蒙思想洗禮的西方才能帶來這種根本的轉變；

第四，根本轉變的必然結局是：按照現代西方的形象，塑造出另外一個「嶄新」的中國。意思是若中國走上了現代化道路，也是由西方複製而來的。

20 世紀 70 年代「現代化理論」對「傳統」與「現代」之關係的再闡釋：

與 50、60 年代「傳統」與「現代」對立的觀點不同，70 年代某些「現代化理論」學者對「傳統」與「現代」的關係作出了全新的闡釋，認為：「傳統」與「現代」並不構成對立的關係；並且，傳統中的一些特徵也可能是推進現代化的一股力量。

然而，這些學者的「現代化」觀點還未能擺脫用以西方為中心的史觀去瞭解世界的發展。

20 世紀 70 年代，美國興起了另外一股學風：

歷史背景：60 年代後半期，世界動蕩不安，群眾運動四起，有：美國的反戰(越戰)運動和黑人民權運動、歐洲的學生運動、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等等。此時出現了「新左派」(New Left)及若干「新馬克思主義」(neo-Marxist)理論，如：「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帝國主義理論」(imperialism theory)以及「世界系統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這些理論掀起了一股反「美國中心觀」、反「現代化理論」的熱潮。

「新左派」學者批評前期的學者以「現代化理論」來掩飾西方帝國主義的行為。他們認為：「現代化理論」並非學術綱領，而是政治的意識形態。

這些學者指出：自「地理大發現時代」(Age of Great Discovery)開始，不發展國家——第三世界國家/落後地區逐一被納入了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體系，被工業化地區所剝削。

他們認為：中國不能走上現代化道路，並非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阻礙現代化(這是「現代化理論」學者所說的)，而是因為近代中國長期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而日本之所以走上現代化道路，是因為它經歷了中日戰爭(1894—

1895)、日俄戰爭 (1904-1905)，變成了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因此逃脫被納入這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命運。日本打敗中國之後，始見經濟騰飛。戰勝俄國之後，現代化表現更為顯著。

20 世紀 80、90 年代西方「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 的崛興及其對「現代化理論」的否定：

「現代化理論」隨著「後現代主義」的興起，再次受到新挑戰。須知，「後」在這裡具有兩層意思，一是「之後」，例如後工業社會；另外，可以解釋為「反對」。「現代主義」出現於 18 世紀啓蒙時期，是一個「主流」思潮，一直影響著人類的思維方式。「後現代主義」從現代主義開始之時就一直存在，只是「非主流」。

「後現代主義」最初體現於繪畫、音樂等藝術領域，其後逐漸影響到建築、文學以及其他一些學術領域。到 20 世紀末，「後現代主義」全盤否定基於啓蒙理性觀 (rationalism) 和啓蒙普世觀 (universalism) 的現代文明結構。它意味著「現代的終結」。

20 世紀 80、90 年代東亞地區之發展對「現代化理論」的肯定：

當「現代化理論」在西方受到了挑戰和批判，東亞地區在這段時期卻體現了以歐洲啓蒙為目標的發展，為「現代化理論」提供了具體經驗的支援。無怪「現代化理論」在東亞地區時至今日仍盛行。

現代化的史實與定義

從歐洲近世歷史看啓動現代化的先決條件：「俗世化」(secularization) 與「革新」(innovation)：

現代化是歐洲歷史發展的產物。從 14 至 18 世紀，歐洲經歷了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科學革命、農業革命、工業革命以及啓蒙運動，導致歐洲社會出現了

社會大轉型。

由歐洲歷史的事實可得出：要啟動現代化，就要具備兩個先決條件：

第一，「俗世化」：即強調以「人」為本，主張滿足現實生活的需要，而反對過於理想化的行為取向；在一個走向「俗世化」的社會中，人的現實感會愈來愈強，人的理性程度將愈來愈高，而人對社會事務的參與度也會愈來愈強。

第二，「革新」：即摒棄墨守陳規的心態，打破條框。

發展現代化，即從以「神」為中心的社會解放出來，進入以「人」為中心的理性、科學社會。追根究底，「現代化」乃「人」的現代化。

從歐洲近世歷史看現代化的使命：落實「啓蒙方案」(Enlightenment project) / 「現代性方案」(project of modernity)，即建構一個植根於理性、科學、進步觀的文明秩序：

要真正走上現代化之路，必須發揚理性、發展科學。換言之，現代化是一個「啓蒙方案」，即有意識地建構一個植根於理性、科學、進步觀的社會體系。啓蒙思想表現在制度層面最突出的是資本主義的「工業體系」、自由主義的「民主」、民族主義的「民族國家」。

現代化最根本的內涵是工業化，而工業化則建立在「科技革命」的基礎上。科學是瞭解世界的基本方法，而技術則是改變世界的主要工具。工業化是改善人類生活素質的一個必要手段。現代化社會以工業化為基調。工業化雖然是現代化的基本內容，卻不是現代化的全部。它只是現代化中許多價值與目的的其中之一而已。

「西方現代性」(Western modernity)的具體指標：

現代化所帶來的「現代性」，即現代社會的基本屬性和特徵，以及反映這些現代社會特徵的指標體系。因此，現代化也可以理解成一個「現代性方案」(project of modernity)。直到二十世紀中葉，所謂「現代性」，乃建基於啓蒙運動的理性、

科學、文明之上，是單一的「西方現代性」，具體指標如下：

1. 生產方式機械化（工業化、農業機械化）；
2. 由工業化直接啟動的都市/城市化；
3. 社會成員參與公共事務的擴大化；
4. 個人價值的肯定；
5. 教育（尤其是科學知識）的普及化（前三項乃「俗世化」的結果）；
6. 交通、通訊網的擴張；
7. 社會結構的「科層化」（bureaucratization）（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認為，任何國家走向現代化之路，都經歷一個「科層化」過程。指一種依功能分「科」（即專業化），並按照權威分「層」的組織方式，不僅是經濟領域如此，在政治、軍事、文化領域也同樣）；
8. 國際關係的增進。

「現代變革」（*modern transformation*）的內容與指向：

國家走向現代化，必將經歷「現代變革」。具體內容是：

經濟上，從傳統農業文明轉變為現代工業文明；政治上，從封建專制制度轉變為現代民主制度；文化上，從蒙昧群體主義轉變為自覺個體主義，建立起獨立自主的人格。

民主制度的七項內容包括：權力法律化、政黨多元化、軍隊國家化、選舉直接化、政府責任化、職能分散化、參與廣泛化。

20 世紀末業全球現代化、全球化及「另類(多元)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 的崛起：

隨著西方國家的擴張，西方的現代化也逐漸影響了非西方國家。「現代化理論」盛行之初，流行所謂「匯流論」(*theory of convergence*)。該理論認為，現代化從西方擴展到非西方地區，終會創造一個具同質性的世界，也就是全球性的西

方現代性翻版。

20 世紀末葉，全球現代化的趨勢不僅沒有如「匯流論」所說的一樣，反而助長了另外一種發展，即「現代化的本土性」，即在非西方世界中衍生了「另類（多元）現代性」，如東亞的「非個人主義式的資本主義現代性」（non-individualistic version of capitalist modernity）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些都打破了西方社會對「現代性」的壟斷。

現代化概念的界定如下：

所謂「現代化」，是以工業為發端、以一個個民族的實體為載體的社會變革。這種變革的結果是帶來現代社會。

現代化的概念有兩層含義：第一，「現代性」的體現，是現代社會的屬性。對已經實現現代化的國家而言，「現代性」是一個結果、一種狀態；而對於發展中國家、後發展國家而言，「現代性」是目標體系。第二，現代化也是實現現代社會的過程，是一個動態的歷史過程，也就是「現代性」的「化」。

現代化在中國

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制度化儒家」（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其核心內容是「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和「五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核心價值是「仁」。

傳統中國是一個以家庭（族）、男性、父權、農業、家庭手工業為中心、自給自足、知識未普及的農業社會。

同時，中國文化走的是「泛道德主義」（pan-moralism）之路，即人間的任何事物都逃脫不出道德的審判。中國人對價值的追求和固守，超過了對事實的分析，故發展不出現代科學。

中國現代化的開端：回應扭曲的「西方現代性」(即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之衝擊：

中國的現代化始於 19 世紀中葉，屬於「晚發外生型」，有別於「早發內生型」的西歐國家。中國的現代化是被西方所啓動。在這個層面上，西方充當了「侵略者」與「文明使者」的雙重角色。對充滿「文明的使命感」(civilizational mission)的西方來說，中國與第三世界的現代化歷程，是一種「文明化過程」(civilizing process)。

然而，中國在 19 世紀接觸到的西方文明，是「現代性」大扭曲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中國進行現代化，是爲了回應這個扭曲的「西方現代性」的挑戰，是被迫的。因此，中國的現代化之根本動力來自「雪恥強國」的意識。在很大程度上，中國以及第三世界的現代化，是一種「反西方的西化」(anti-Western Westernization)。

同時，中國現代化的開展，標誌著傳統「華夏中心主義」(Sino-centrism)的沒落。對長期被封鎖在一個自給自足的「價值之幕」(value curtain)裏的中國人來說，置身在這樣一個大變動時期是不易適應的。

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從文化層面來理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可以說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器物技能的現代化：從洋務/自強運動開始。

由於西方的「船堅炮利」嚴重威脅中國，中國也開始追求「船堅炮利」。傳統的「經世致用」精神，確實能爲中國早期的現代化提供原動力。洋務思潮經歷了由「師夷長技以制夷」到「中本西末」，再到「中體西用」的過程。而洋務運動又經歷了由發展軍事國防工業到發展民用工業，即由「求強」發展到「求富」及「富強並舉」的方針。

第二階段是制度的現代化：從百日維新、清末新政、辛亥革命開始。

甲午戰爭之後，部分有學識的人認識到現代化國防不但需要現代化的交通、教育、經濟，並且需要有現代化的政治和國民，故主張「體」與「用」皆須變革。

有人主張「君主立憲」，也有人主張「共和政體」，遂產生了百日維新、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的歷史事件。

第三階段是思想、價值、行爲的現代化：從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開始。

民國成立以後，「共和」有名無實，更有復辟之舉，先進的知識分子認為中國需要的是國民思想、態度、價值觀以及人格的改造，故產生了「打倒孔家店」、迎接「新思潮」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值得注意的是，三個階段的發展並行不悖。第二個階段的開始不等於第一個階段的結束。第三個階段的開始不等於第一、二階段的終結。就推行現代化而言，第一個階段是改革，第二個階段包括改革和革命。第三個階段是革命，並且是深層次的文化革命，有別於第二階段的政治革命。從 1928 年南京國民政府主政開始到 1949 年，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模式的改革是中國現代化的主流。挑戰這套模式的是一種自下而上、動員群眾的共產主義革命。1949 年實現了現代化範式的轉變，革命成爲了主流。由 1957 年到 1978 年，中國實行「以階級鬥爭爲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1978 年底，再度體現了另外一次現代化範式的轉變，即以「改革開放」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特徵：強調「救亡」和集體價值：

現代化進程的特徵，實與現代化運作背景密切相關。前面說過，中國推行現代化是被迫的。還有，從 18 世紀末、19 世紀初開始，中國出現人口過剩、自然資源相對稀缺的現象，19、20 世紀又長期處於憂患當中，因此推行現代化是以解決國家民族所面臨的危機爲依歸的，具有功利的目的。新文化運動原本的目的是要把西方的啓蒙文化帶來中國，但是中國當時的當務之急卻是「救亡」，其導致的結果就是李澤厚所說的「救亡壓倒啓蒙」。

另一方面，作爲一個後發展國家，中國的現代化急需政府的參與、主導以及推動。又因政府長期面臨嚴峻的局勢，故當權者無一例外地把個人利益置於集體利益之下。這裏的集體，可以指國家、民族、政黨、階級、群眾等，以致集體價

值觀始終壓倒個人價值。這是中國無法擺脫的一個傳統。儘管知識分子、社會改革家的自覺性理念對現代化進程起了某些作用，但現代化的大方向、目標、策略等，總是取決於政治領袖的主觀意志，即現代化要為政治服務。

中國現代化的成效：三位專家的意見：

(1) 徐中約著，計秋楓、朱慶葆譯：《中國近代史》，上、下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1年）[Hsu, Immanuel C.Y.,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th edition, 2000)]

這本書的英文書名已經反映了作者的觀點：當今中國已經是一個現代化了的國家。中譯本的書名未能帶出作者的觀點。我認為可以翻譯為《現代中國的崛起/崛興》，以反映作者對於中國現代化的理解——中國是如何變成一個現代化國家的。

(2) 史景遷著，溫洽溢譯：《追尋現代中國》，3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Spence, Jonathan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W. Norton & Co., 2nd edition, 1999)]

從書名也可以看出作者的觀點：中國人從十九世紀開始已經自覺地去追尋現代化，但是到了二十世紀末，仍在追尋中。

(3) 金耀基 (King, Ambrose Y.C.)：《中國的現代轉向》 [*The Modern Turn of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根據金耀基的理解，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實標誌著中國傳統文明的一個「現代轉向」。中國的現代化，不僅是對於富強、獨立、自由的追求，同時也是中國實現「現代性」建構，亦是對一個現代文明秩序的塑造。

並且，自十九世紀、經二十世紀到現在，這個大轉向還正在進行。是一個帶來根本性社會文化之變遷的「漫長革命」。當今中國現代化也是全球現代化的一個組成。中國的「現代性」，與其他國家的現代性有共通點，但也無可避免地有「中國的文化性」（包括西方制度、價值觀的「中國化」）。

可見，金耀基與史景遷的觀點相似：中國仍然是一個現代化中的國家，仍然是一個尋求建立一個現代文明秩序的國家。

(二) 清末新政與中國政治現代化

八國聯軍進京後的局面與清廷頒佈新政的目的

1900 年對中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此後，清政府的統治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原因何在？主要是因為《辛丑條約》(1901 年 9 月 17 日)的條款比以往任何條約條款苛刻，包括：處死官員、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拆除炮臺、在四十五個城市停辦科舉五年等等。這使清廷認識到非改革不可，遂開創了徹底改革的局面。許多學者提出一種意見：清廷改革的誠意不足。

探討改革的誠意，必須著眼於改革的目的。從下放權力給漢人的角度來看，可以批判清政府的改革無誠意。無可否認的是，所有主持改革的統治者最大最終動機，是希望通過改革的成果來鞏固、加強自身統治的合法性基礎。而清政府的改革目的，無疑是加強中央集權，以確保其統治地位的穩固不變。從這個角度來分析，我們無須懷疑其改革的誠意。

當時的局面，可與四分三個世紀後的局面作一比較。「文化大革命」(1966-1976) 結束，中國共產黨面臨「三信危機」，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8 年 12 月)上臺後，認為非推行徹底的改革不可，遂開創劃時代的「改革開放」局面。我們亦無須懷疑其改革的誠意。

清末新政 (1901—1911 年) 的內容

清廷於 1901 年開始推行的改革，是全方位、多層面、空前的變革。有關改革詳情，可參看：(1) 徐中約著，計秋楓、朱慶葆譯：《中國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2001 年)上冊，第十七章〈清末新政和立憲派〉；(2) 費正清、劉廣京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 1800—1911

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下卷，第七章〈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這裏只作扼要、簡單介紹。

首先，是在行政制度方面的改革與預備立憲。改革包括：精簡官僚機構、裁汰冗員、創設新官署。並且，於1909年舉行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選舉，同年成立諮議局，1910年10月成立資政院。

1909年，全國各省舉行第一次諮議局選舉。選民資格為：滿25歲之男子，在選區內居住10年以上而具有下列資格之一：有5,000元以上之不動產；中學畢業。候選人資格相同，但須滿30歲。當時的選民只佔總人口0.45%，但此舉已是政治現代化的進程中重要的一步。還有，諮議局、資政院是中國第一批具有現代議會性質的政府機構。

在軍事制度方面的改革包括：廢武科、創設武備學堂、建立練兵處。結果是出現新式軍人階層；他們素質較高，在掌握現代軍事裝備和技術的同時，也較易受自由民權思想的影響，開展了軍人政治化的趨向。

教育方面的改革包括：以時事策論取代「八股文」、設新式大學堂、中等學堂、初等學堂、廢除科舉考試。廢除1,300年來的科舉制度，的確是具有革命性的意義。清廷又挑選學生出國留學(1901年：不足300人。赴日留學生：從1901年274人增至1908年3萬人；赴歐留學生：1908年達1.2萬人)，這又是非常重要的一項改革，培養了一批現代知識分子。

此外，還有財政、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改革，加速了社會變革的步伐。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改革釋放出變革社會的能量，卻不能將其納入推進制度變遷的非革命性途徑，反而引發了革命，這是清廷想不到的。

(三) 共和革命與中國政治現代化

孫中山對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貢獻

長期以來，史學家把辛亥革命的歷史說成是孫中山個人革命的歷史，以此突

出孫中山對推翻清朝的貢獻。而這一觀點亦受多數人贊同。持相反意見者則指出：孫中山自 1895 年廣州起義失敗後便離開中國，雖然長期致力籌款支持革命，但在歷次起義當中鮮有親身督師（1907 年廣西鎮南關一役除外），就算武昌起義也是在事成後才由美國趕回來，故不應誇大他的貢獻。可謂見仁見智。

我認爲孫中山對推翻專制及對中國政治現代化是有貢獻的，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孫中山創造了一個革命傳統。他成立第一個反清革命組織——興中會，藉以「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檀香山興中會盟書〉，1894 年 11 月 24 日）；並且，策動第一次反清革命——廣州起義。

在此必須解釋「革命」這個詞：有現代意義的「革命」（revolution）一詞，始自啓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時期，意指帶有進步意義的歷史變化。早在中國的《易經》中也有提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意即按照「天命」改朝換代，這與現代的「革命」有所不同。康有爲也曾經在《法國革命記》寫法王失去「天命」，又批判「革命」造成社會動亂。而當時傳教士（如 Timothy Richard 李提摩太）則將“the French Revolution”譯成「法國大亂」。

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逃往日本，曾表示從此將自己的政治活動稱爲有進步意義的「革命」。他大概是中國第一個用帶有現代意義的「革命」這個詞語來形容自己政治活動的人，創造了一個革命的傳統。

其次，孫中山創建了第一個革命政黨——同盟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帶有現代性質的政黨。在《同盟會宣言》（1905 年 8 月）中，孫中山爲革命性質定位：「前代爲英雄革命，今爲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軍政府特爲其樞機而已。」「國民革命」之目標爲：「（一）驅除韃虜；（二）恢復中華；（三）建立民國；（四）平均地權」。「國民革命」之進程分三期：「（一）軍法之治；（二）約法之治；（三）憲法之治。」

第三，孫中山創造了一套革命理論。1905 年 10 月 20 日，孫中山在《民報》

發刊詞中提出了「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並在 1906 年 12 月 2 日的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中作了解釋。

在闡釋「民族主義」時，孫說：「民族主義，並非是遇著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許那不同族的人來奪我民族的政權。」

在闡釋「民權主義」時，孫說：「我們推倒滿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把來分作兩次去做。講到那政治革命的結果，是建立民主立憲政體。」

在闡釋「民生主義」時，孫說：「我們實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時候，須同時想法子改良社會經濟組織，防止後來的社會革命。……兄弟所最信的是定地價的法。」

孫中山在作總結時這樣說：「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為眾生謀幸福，因不願少數滿洲人專利，故要民族革命；不願君主一人專利，故要政治革命；不願少數富人專利，故要社會革命。」

「三民主義」不但是革命的綱領，亦可稱為中國歷史上比較完整的現代化發展之策略。

(四) 從政治現代化的角度再探討清王朝的覆亡

中國政治現代化的兩個先鋒：君主立憲派與共和革命派

其實，立憲派與革命派的關係不應被視為保守勢力與進步勢力的對立關係。

立憲派與革命派有一些共同主張：兩者都是中國政治現代化的先驅；都致力於革新中國的政治組織，並認為代議政治適合中國；都要求民主，主張民權，主張提高政府的效率和中國的國際地位。

立憲派與革命派的分歧主要在於：第一，中國現代政治的形式應採取君主立憲還是共和政體；第二，達成現代政府的方法是改革還是革命。值得注意的是：立憲派所反對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革命這一手段。孫中山走遍歐美，認為中國

落後，應效仿美國。而梁啟超於 1903 年遊歷北美後，亦承認中國落後；不過，梁認為中國情況不像美國而與法國相似，認為革命將導致混亂和軍事強人的統治。

《新民叢報》與《民報》於 1905—1907 年展開了激烈的論戰，反映出兩派分歧所在：

第一，立憲派認為漢滿兩族在很多方面已溶為一體了，主張用合法手段去爭取開放政權，並確信清廷誠心誠意地預備立憲。其基本態度是「容滿」。革命派則認為滿清一向採取歧視及壓迫漢人的政策，以「假立憲」欺瞞中國人民，不可能建立妥善的政府，所以若想有效地改革必須先消滅滿清政府。其基本態度是「排滿」。

第二，立憲派認為建立共和政府要有先決條件、要漸進，即人民必須先達到某種程度的教育水準，並有參與政治的實際經驗。革命派則強調快速的變革、急速的現代化，並批評立憲派低估了中國人的實力。

第三，立憲派恐怕革命會導致外力干涉。革命派則想爭取列強的同情及支持。

革命派與清廷：長期鬥爭

革命派與清廷長期處於對立、對抗的關係。1895—1911 年 10 次起義失敗後，革命派才於上海成立同盟會中部總會。湖北的革命組織共進會和文學會雖與同盟會有聯繫，卻非同盟會的一部分。辛亥革命的爆發是出乎同盟會人意料之外的，其過程亦不大受同盟會人控制，其結果更與同盟會人的預期相差很大。

立憲派與清廷：從合作到決裂

立憲派與清廷的關係則較為複雜，經歷了從合作到決裂兩個階段。前面論述立憲派與革命派的分歧時，已解釋立憲派支持清廷籌備立憲的原因。立憲派與清廷其後交惡，兩者的矛盾衝突可分為三方面：

第一，政治上的矛盾與衝突，主要涉及召開國會及限制皇權的問題。必須指

出，新選出的諮議局議員，大多屬立憲派的紳商，他們面臨洶湧澎湃的革命潮流，遂於 1910 年 1、6、10 月三次向滿清政府請願，要求立即召開國會、準備立憲。1910 年 10 月資政院開幕，清廷只答應把預備立憲日期由 9 年縮短到 6 年。這使許多立憲派人士決定雖不會主動參與革命，但一旦革命爆發，將保持中立的態度。1911 年 5 月清政府成立內閣，13 個任命者當中只有 4 個漢人，5 個是皇親國戚，被譏為「皇族內閣」，激起了立憲派的不滿。

第二，經濟上的矛盾與衝突，主要涉及鐵路國有化的問題。由於許多立憲派紳商在四川、廣東、湖南、湖北投資鐵路，而清政府卻於 1911 年 5 月宣告將鐵路國有化，直接打擊這班投資者的經濟利益，使立憲派更為不滿。

第三，立憲派於武昌起義後的最後抉擇。1911 年 12 月，14 個省的諮議局宣佈獨立，令清政府孤立無援。1912 年 2 月清帝退位，可說一半得之於地方獨立，一半得之于袁世凱的中央政變。

清王朝覆亡的歷史意義和啓示

辛亥革命創建共和，是中國走上「現代」的象徵，也是中國古老文明的政治秩序解體的標誌。帝制在一般中國人心目中成爲一種逆現代化潮流的反動現象，從此在中國政治舞臺上消失，這是辛亥革命最大的成就。

傳統史學家認爲，清王朝的覆亡，是建制外的進步勢力打倒建制內的保守勢力的結果，這種看法雖有一定合理性，卻把複雜的歷史實際簡單化。清廷在其統治最後的十年間是一個積極推行改革的政府。重大的制度變革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帶來了高升的期望，帶來了利益重新分配，但亦帶來了改革者未能預期的、超越了自己能力所能解決的問題，最後令改革者處於進退兩難的局面。可以說，清王朝的覆亡在某個程度上是建制內矛盾激化的結果，是一個改革的政府與建制內各種既得利益集團衝突、決裂所造成的結果。20 世紀初，共和、立憲的呼聲高唱入雲。清王朝雖盡力掙扎求存，但最終還是被政治現代化的巨浪吞噬。

改革、革命與中國現代化

改革與革命是清末政治的兩個主流。改革失敗及引發革命，並非是因為改革本身的性質問題，而是由於改革進程中許多主觀、客觀因素所導致。

在二十世紀期間，人們對改革與革命的看法，經歷了很大的變化。辛亥革命之後，受反滿觀點和革命觀點影響，人們認為改革是保守的，不徹底的，革命比改革先進。從 80 年代開始，人們厭倦了革命，認為要告別革命，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否定了革命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起的積極作用。

其實，從長遠的歷史角度看，改革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普遍方式，革命則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一種特殊形式。在人類的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中，並不存在改革與革命誰優誰劣的價值判斷問題。

第二講 民初歷史的弔詭： 政治現代化的大倒退、思想現代化的大躍進 (1912—1928年)

(一) 袁世凱倒行逆施與共和理想幻滅 (1912—1916年)

共和的剎那光輝：第一屆國會選舉（1912年12月—1913年1月）與國民黨的勝利

民國成立之初，共和曾有過剎那的光輝。這麼說是因為：1912年12月—1913年1月舉行了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國民黨獲得了勝利，而國民黨的領導人宋教仁是一位非常投入於「民主共和」的領袖。

民初的《選舉法》，實基於1909年全國各省第一屆諮議局選舉法，但向前邁進了一大步。選民資格如下：滿25歲之男子(1909年為21歲)，在選區內住滿2年以上(1909年為10年以上)，兼具有下列資格之一：有不動產500元以上(1909年為5,000元以上)，小學畢業(1909年為中學畢業)。此改動使選民佔總人口10.5% (1909年僅佔0.45%)。候選人資格相同，但須滿25歲(1909年為30歲)。

選舉中宋教仁組織了國民黨，而袁世凱則組織了一些政黨與宋教仁對抗，即統一黨、共和黨、民主黨(其後三黨合併為進步黨)。袁曾於晚清時期對中國的軍事現代化作出了很大貢獻。但他不信「民主」，認為「共和」會帶來混亂，非有一點權威不可。袁曾說：「我這個總統，總也總不得，統也統不得」；又說：「憲法只會限制我，沒有一點是幫我的。」由於他急於抓權，故不惜採取了恐嚇和賄賂的手段來阻止國民黨勝出，但國民黨還是在選舉獲取勝利：在眾議院596席中獲得了269席，在參議院274席中獲得了123席。當時眾議院是按各省人口比例選出的，每800,000人選1人；參議院則按各省省議會選出代表，每省議會選出10人。

袁世凱的反撲與民主進程的大轉折：政治軍事化 (militarization of politics)

袁世凱為奪回權力，採取了一系列的行動。1913年3月20日，當宋教仁準備從上

海前往北京領導國會、組織責任內閣時，在上海火車站遭到刺殺。有證據顯示，主使這樁政治暗殺的人，正是袁世凱。宋教仁的死，証明了用國會和責任內閣來牽制袁的權力是無法實現的。當時孫中山主張用武力推翻袁世凱，可惜力有不足。

袁世凱深知欲要取回權力，資金非常重要，於是又與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於 1913 年 4 月簽署 2,500 萬英鎊的所謂「善後大借款」。借款未經國會批准；他還答允於 47 年內還本利共 6,785 萬英鎊。

為主動打擊革命黨，袁又於 1913 年 6 月罷免國民黨都督李烈鈞（江西）、胡漢民（廣東）、柏文蔚（安徽）。此舉引發了「二次革命」。由於當時人民渴望和平、安穩的生活，使革命黨處於孤立地位；又由於革命黨缺乏資金，不久便被鎮壓。9 月，「二次革命」宣告失敗。袁世凱遂派心腹到各地取代國民黨都督（如派段祺瑞到武昌、馮國璋到南京），這樣做使得北洋軍人勢力到處擴張。

另外，袁在 1913 年 11 月解散國民黨、1914 年 1 月解散國會、1914 年 2 月解散省議會及所有地方自治團體，這直接打擊了地方勢力。孫中山 1914 年再次流亡日本，把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到此，議會政治告終，獨裁政治擡頭。

1914 年，袁世凱的勢力達到了頂端。是年 3—5 月，袁召開國民大會，修改《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制定新的《中華民國約法》，改總統制為世襲。中華民國因此出現了兩部憲法，加深了由帝制崩潰所導致的法統危機。

1915 年 5 月，袁不理段祺瑞、馮國璋、梁啟超等人的反對，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這導致建制內部分裂。當時許多人支持集權中央，但反對袁世凱對日本妥協。袁世凱的權力因此受到了削弱。

最後，袁於 1915 年 8 月開始推行帝制復辟運動。蔡鍔在雲南組織護國軍反對帝制，各省紛紛響應，相繼宣佈獨立；袁於 1916 年 3 月被迫放棄「洪憲帝制」美夢，並於 6 月 6 日去世。

袁世凱與軍閥割據的關係

一般歷史學家認為袁世凱是「軍閥之父」。原因如下：

第一，袁統領北洋軍，而北洋軍是後來眾多軍閥隊伍的前身；

第二，袁當總統時刻意將北洋軍人勢力擴至華中、華南地區；

第三，袁用武力去解決一切（包括非軍事）問題，立下了壞榜樣，並形成了「政治軍事化」的局面，此為軍閥割據時期的一個特色。

上述三點反映出袁世凱與「軍閥割據」有一定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袁最關注集權中央，故極力防止軍事分離局面(military separatism)出現。他於 1914 年權力最高峰時把各省都督（都督管理軍事、民政）改為將軍，只管軍事，另設巡按使一職，理論上職位高於將軍，掌管民政，以牽制地方軍人力量，無奈政策未能生效。可說，袁死後出現軍閥割據，絕非袁所想見到的局面。因此，袁世凱與軍閥割據的形成有很大關係，但並非他個人希望造成的。

（二） 軍閥割據：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全面軍事化 (1916—1928 年)

何謂「軍閥」？

所謂「軍閥」，是指擁有私人軍隊，控制著或企圖控制一定的地盤，一切所作所為都出於維護其自身權益的軍事將領。

晚清地方勢力抬頭 (regionalism) 與民初軍閥割據 (warlordism)

西方學者稱晚清時期「地方勢力抬頭」為“regionalism”，又稱民初「軍閥割據」為“warlordism”。香港學生每見英文字尾加上“ism”，都以為是「——主義」的意思，故把“regionalism”說成是「地方主義」，又把“warlordism”說成是「軍閥主義」。其實，“regionalism”與“warlordism”並非兩種主義，而是兩個歷史現象(historical phenomena)。

晚清地方勢力抬頭與民初軍閥割據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在此比較兩者的異同。

相同之處在於：兩者皆代表一種離心力量(centrifugal force)，導致權力分散(decentralization)甚至地方分離(separatism)現象的出現。

不同之處主要有三點：

第一，地方領袖(regional leaders)與軍閥(warlords)的出身、價值觀不同：地方領袖全是科舉(即儒家)出身，稱為「士人」。而軍閥出身較為複雜，有武科出身(張勳)、新式武備學堂出身(段祺瑞、馮國璋、曹錕、吳佩孚、李宗仁)、日本軍校出身(閻錫山)、新式學校出身(陳炯明)、農兵出身(馮玉祥、張作霖)、土匪出身(張宗昌)；

第二，地方領袖與軍閥對中央政府的態度不同：地方領袖效忠中央政府，而軍閥稅收不歸中央，任命地方官員不受中央管轄；

第三，地方領袖之間的關係與軍閥之間的關係不同：地方領袖聽命中央，不會打內戰，軍閥之間則互相傾軋、爭霸。

從這些角度去看，雖然軍閥割據在某程度上是從晚清地方勢力抬頭發展而來，但兩者有很大差別。

軍閥割據的緣起及發展：軍人參與、干涉、把持政治的過程

軍閥割據這個歷史現象，可說是軍人參與、干涉、把持政治的過程。這個過程可分七個階段說明：

第一階段：清末新政——新式武備學堂與新式軍人階層出現。部分軍人對政治開始感興趣，產生了軍人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military men)的趨向。新軍參與革命活動是軍人政治化的體現。

第二階段：清朝覆滅，共和成立——皇權崩潰，法統(政權合法化)危機(crisis of legitimacy)出現。皇權政治建基於「天命」；革命打倒了皇權，卻未能樹立新權威。當時，「皇帝」在人們心裏已根深蒂固，「總統」卻仍未完全被接受。

第三階段：共和理想幻滅——革命勢力退卻，軍人勢力滲透全國範圍。儘管共和成立，革命勢力卻只局限於廣東、安徽、江西幾個省。「二次革命」後，袁世凱解散國民黨，孫中山再次逃亡到日本，北洋軍人勢力席卷全國。

第四階段：袁氏獨裁——議會制度崩潰，一切依賴武力解決，即政治軍事化(militarization of politics)。

第五階段：討袁之役——以武力反復辟，加劇政治軍事化。袁世凱企圖恢復帝制，這是個政治問題，本應以政治途徑解決，但無法實現。蔡鍔建立護國軍以武力解決問題，各省響應，加強了政治軍事化。

第六階段：南北戰爭——「護法運動」出現，加劇法統危機。袁世凱死後，孫中山從日本回來領導「護法運動」，以 1912 年制定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為正統。而當時統治中國的北洋政府，則以 1914 年制定的《中華民國約法》為正統。人們對法統這個大是大非問題，爭持不休，到底何為正統的「法」，無法達成共識。

第七階段：勢均力敵局面(equilibrium of fragmented military forces)出現——軍閥割據現象持續。軍閥割據的時期出現了大小不一的許多軍閥，但沒有一個能夠消滅其他的軍閥，因此需要聯盟。由此角度看，割據持續久遠的現象可以得到解釋。

可見，軍閥割據是由「軍人政治化」發展到「政治軍事化」（以武力解決國家社會的所有問題）的一個過程。從另一個角度看，軍閥割據是一個過渡時期的產物：即舊秩序已經解體而新秩序還未建立起來的過渡時期；那是一個無任何秩序可言的時代，而「沒有秩序」也成為這個過渡時期的特色。

軍閥割據究竟持續到那時？一般歷史學家以 1928 年為軍閥割據時期的下限。這個設定合理嗎？上述問題，留待第三講解答。

軍閥割據時期的中國

下面說說當時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特色。

政治方面：

在 1916—1928 年間，1,300 個大、小軍閥打過 140 場大、小戰爭。打仗，主要是為了爭奪地盤。大軍閥爭奪中央政權，因為誰控制了中央政府，誰就能合法地舉借外債，發行公債，把持中央財政。小軍閥也爭奪地盤，因為沒有地盤就沒有徵稅和招兵買馬的基地。長期戰爭，導致政局極度動盪不穩。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權，頻頻易手，直接影響行政效率。

軍閥們爲了鞏固和擴充地盤，皆以開源爲其一切政策的依歸。儘管中國還有總統、內閣、國會，共和卻名存實亡，一切取決於當權者的主觀意願。中國明顯地仍是一個人治國家，管治的準則仍未改變。

軍閥們以武力爲解決一切問題（包括非軍事問題）的手段，又把大量軍方人員安插到各行政單位，擔任文職工作，使政治更邁向軍事化。

經濟方面：

軍閥混戰，嚴重破壞社會生產力；政權四分五裂，根本無法落實全國性的、甚至區域性的經濟發展計劃，阻礙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軍閥們雖然每能達到開源目的，但往往把在其控制範圍內的金錢、資源、人力、物力花光於戰爭及其他軍事用途上，這對現代化有不良的影響。唯一得益的大概是軍事和軍火工業。

不能否認，中國的民族工業（包括紡織、麵粉、絲綢、火柴、水泥、煙草、糖等工業）在軍閥割據時期有長足的發展，但這與軍閥統治無直接關係。當時工業之所以得到發展，實由各種內外因素促成。外因是：第一次大戰期間，國際市場對中國民用工業製成品及中國農礦初級產品原料的需求大增。內因是：政府大部分精力用於爭奪地盤，對現代經濟的控制放鬆，有助民族工商業的興起。又民國成立後，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之風盛極一時，致使中國培育了第一批企業家、科學家、經濟學家、工程師、經理和技術人員，形成了新的社會力量，有助推動工商業發展。

社會方面：

對一般人來說，生存是最大的問題。由於戰爭與天災，到處都出現飢荒。更不幸的是，軍閥割據使傳統的全國性的官方救濟機關完全停止運作。美國紅十字會又因飢荒每多是人禍（軍閥的戰爭）造成而拒絕救濟；The 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 只好更改了飢荒的定義之後才實施救濟。軍閥割據時期出現了大量農民離村及人口大遷徙的情況，令社會更動盪不安。

文化方面：

出現了春秋戰國後的另一次百家爭鳴的局面。似乎在中國歷史上，中央政權崩潰之時，總是會有思想的革命，不知是定律還是巧合。

(三) 軍閥割據時期的文化、思想革命：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的定義

時人所指的五四運動：

時人所說的五四運動，是指 1919 年 5 月 4 日在北京發生的一件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該事件在全國範圍內引起廣泛的反響；直到 7 月下旬，事件才告一段落。具體情況如下：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數千學生上街遊行示威，反對凡爾賽和會有關山東問題的決議；32 人被捕。

1919 年 5 月 6 日：被捕學生獲釋，但北大校長蔡元培其後被迫離任。政府派親北洋軍閥的官員擔任新一任校長，引起新一輪抗爭。

1919 年 5 月 18 日：北京學生發起罷課、杯葛日貨運動，並在《罷課宣言》中首次用「五四運動」一詞（學生領袖羅家倫為它起的名詞）。運動擴大到其他城市。

1919 年 5 月 26 日：有人在文章中談及「五四的精神」。

1919 年 6 月 3-4 日：北洋政府逮捕千多學生。

1919 年 6 月 5-9 日：上海工商界發起罷工、罷市，支援學生；運動擴大至各大城市；9 日，北京親日官員被迫辭職。

1919 年 6 月 28 日：中國代表團拒簽巴黎和約，代表了五四運動獲得勝利。

1919 年 7 月 22 日：中國學生會宣佈停止罷課，蔡元培復職。

後世一般歷史學家所指的五四運動：

1935年5月，胡適談五四運動時說：「當年若沒有思想的變化，決不會有五四運動。」（見〈紀念五四〉，載《獨立評論》，1935年5月5日。）胡講「思想的變化」，當然是指「新文化運動」。其後歷史學家所稱的五四運動，多數是從廣義而言，即包含當時所稱的「五四運動」（史家叫「五四事件」May Fourth Incident）及該事件發生之前、之後崛興的「新文化運動」（孫中山最早用的名詞）。即是說，五四運動泛指1915—1921（有說1923）年間的一系列思想、文化、政治、社會活動，包括：文學革命；迎接新思潮與反傳統；學生遊行、示威、罷課；杯葛日貨；工商界罷工、罷市。各項活動的背後動機是救亡；故五四運動是一場反傳統、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愛國運動。

新文化運動：現代中國的第一次文化、思想革命

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是18世紀歐洲啓蒙運動的中國版，以「科學」（理性）和「民主」（人權）為整個運動的題旨。它是現代中國的第一次文化、思想革命。

新文化運動興起的原因：

新文化運動興起的原因可分為兩點。

第一，一些先進知識分子在啓動新文化運動的《新青年》雜誌上發表文章傳播新思想，起到了指導、啓蒙的作用。《新青年》原名《青年雜誌》，由陳獨秀於1915年9月創辦。在創刊號，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向青年提出6項指導性的原則：

1. 自主的而非奴隸的；
2. 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3. 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4. 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5. 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6. 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青年雜誌》1916年春停刊，9月復刊，改名《新青年》，以「改造青年的思想，輔導青年的修養」為復刊宗旨。《新青年》提出：中國社會的改造，應建基於國民（尤其是

青年) 的人格、素質和價值觀念的更生。這成爲新文化運動啓蒙思潮的主體內容。

第二是北大新任校長蔡元培的改革。蔡元培訂定大學教育的目的是「探求學理、掌握科學知識、培育人才新風」，又訂定辦大學的方針是「兼容並包、思想自由」。從 1917 年開始，北大出現了非常活躍的氣氛，可謂百花齊放。師生們各自創辦雜誌，宣揚自己的主張：有由先進知識分子（如陳獨秀、胡適）辦的《新青年》、由先進學生領袖（如傅斯年、顧頡剛、羅家倫）辦的《新潮》；亦有由傳統保守知識分子（如劉師培、辜鴻銘）辦的《國故》，並得到校外學者嚴復、林紓的支持。

新文化運動的內容：

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有二：第一，文學革命；第二，新思潮與反傳統。

先談文學革命。

文學革命主要是反對文言文，提倡用白話文寫作。又反對文以載道（即宣揚儒家價值觀），鼓吹寫實主義 (realism)。

爲了奠定白話文寫作原則，胡適提倡「八不主義」，即：

1. 不用典；
2. 不用陳套語；
3. 不講對仗；
4. 不避俗字俗語；
5. 須講求文法之結構；
6. 不作無病呻吟；
7. 不摹仿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
8. 須言之有物。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胡適鼓吹「八不主義」，他還是談「文學改良」而非「文學革命」。(見〈文學改良芻議〉，載《新青年》，1917 年 1 月 1 日。)

提出「文學革命」這個口號的第一人是陳獨秀。陳認爲要推行「文學革命」，就必須要：

1. 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2. 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3. 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見〈文學革命論〉，載《新青年》，1917年2月1日。)

自1918年1月開始，《新青年》完全採用白話文。這時期出現了新詩、戲劇、散文、短篇小說(如魯迅的《狂人日記》)、用白話文翻譯的現代歐洲文學。可以說，中國文學界步入了新的創作階段。「五四事件」發生後的半年間，中國出現了400多份新的、採用白話文的期刊。1920年3月，中國政府正式宣布白話文為國語。小學、中學的課本都一律棄用文言文。

白話文運動是新文化運動中收效最快、成就最顯著的一個領域。它創造了一個語義系統，適應了現代社會心態及與外部世界交流的需要。

還有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文學界的先進分子在棄用文言文這方面已達到共識，但是對於文學該走哪個方向則爭論紛紛。因此，五四作家很快便分道揚鑣。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文壇上主要分成了兩派。其中一派的代表人物有周作人、茅盾。他們於1921年1月成立文學研究會，認為文學應反映社會及人的境況，實不自覺地承襲了文以載道的精神，只是他們的「道」與傳統的「道」截然不同。另一派的代表人物有郭沫若、郁達夫、田漢。他們於1921夏成立創造社，深受浪漫主義、個人主義影響，主張為藝術而藝術，偏愛創作藝術。

以下談新思潮、反傳統。

當時許多知識分子嚮往西方的文明，出現了接受西方學說的熱潮。受五四知識分子歡迎的西方學說包括：達爾文的進化論、社會達爾文主義、實用主義、經驗主義、互助論、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科學(「賽因斯」science)、民主(「德莫克拉西」democracy)。最受歡迎的是「科學」與「民主」。

知識分子更以西方思想作為標準來評價儒家學說，因此出現了反孔(子)運動。1916年2月，易白沙在《青年雜誌》1卷6號上發表〈孔子平議〉，首開點名批評孔子的先例。《新青年》於1916年10月起更將「平議」上升為「倒孔」。胡適又把孔子及其信徒

譏為「孔家店」，但胡相對疏離「倒孔」運動。相反，陳獨秀、吳虞、魯迅是「倒孔」先鋒，領導「打倒孔家店」。

陳獨秀認為：「主張尊孔，勢必立君；主張立君，勢必復辟」，「提倡孔教必培共和」，「信仰共和必排孔教」（〈復辟與尊孔〉）。他又認為：孔教道德造成了「君虐臣、父虐子、姑虐媳、夫虐妻、主虐奴、長虐幼」的殘酷現實（〈答傅桂馨〉）。

吳虞說儒家「由天尊地卑演而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婦卑、官尊民卑，尊卑既嚴，貴賤遂別」，這就為專制制度提供了理論依據（〈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他認為「禮教」之遺害最大（〈吃人與禮教〉）。

魯迅則借用諷刺文學批孔。例如，他在《狂人日記》中寫道：「凡事總須研究，才會明白。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由於魯迅的作品深入人心，故其影響更為廣泛。

思想界的先進分子一致認為要摒棄中國的傳統才能救亡，但卻在其他方面意見不合。他們很快便分道揚鑣，主要有兩派。胡適代表其中一派：他堅持要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認為「沒有一種靈丹妙藥可解決中國所有的難題；每個問題必須分開研究，分開解決。」（見〈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載《每週評論》，1919年7月20日。）李大釗代表另一派：他認為「主義」能為解決社會問題提供一個「總方向」，是必須的；必須有個根本解決的方針，才能有希望解決一個一個問題。（見〈再論問題與主義〉，載《每週評論》，1919年8月17日。）

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

現從現代化、思想發展、愛國主義發展三個角度探討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

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化的里程碑：思想現代化的開始：

從文化層面去理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可以說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器物技能現代

化、制度現代化、思想現代化。第一階段從洋務/自強運動開始。第二階段從百日維新、清末新政、辛亥革命開始。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里程碑，因為它標誌著第三個階段（即思想現代化）的開始。問題是：中國為何在民初體現了現代化範式的轉變？理由是：帝制雖滅，但中華民國只有共和的軀殼而無共和的實質，更有復辟之舉，這使關心國家的知識分子明白硬搬外國政治制度來中國實在是徒勞無功的；若要救亡，就要有根本的變革，即徹底改變中國人的態度、世界觀、價值觀，來一次思想、文化革命。

五四運動是近代中國思想發展的轉折點：「整體性的反傳統主義」(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的出現：

首先要承認的是，新文化運動並非一夜間突然發生；可以說，新文化運動是晚清以來中國文化、思想轉變歷程中的一個新高峰。正如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說：“When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evious thirty years,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no longer resembles a mountain range rising up abruptly out of a flat plain, but simply a somewhat higher range in a long stretch of complex mountainous terrains” (Benjamin Schwartz (ed.),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 Symposiu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史華慈指出，晚清思想界出現了「突破的一代」(the breakthrough generation)。代表人物有嚴復、梁啟超。嚴復翻譯、介紹了許多近代西方文化思想的經典著作，包括：《天演論》(T. 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群己權界說》(J.S.Mill, *On Liberty*)、《群學肆言》(H.Spencer, *Study of Sociology*)、《原富》(A. Smith, *Wealth of Nations*)、《法意》(C.L.S. Montesquieu, *Spirit of the Law*)。梁啟超則論述了「自由」、「民權」等西方政治概念，提出「新民說」。他們對促進中國思想現代化所作出的貢獻，絕不能低估。可說，沒有晚清的思想變化，就沒有五四的思想革命。

雖然說新文化運動是前期思想變化的延續，但新文化運動本身又具有其獨特性 (uniqueness)，即林毓生所說的「整體性的反傳統主義」(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見 Lin Yu-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1978；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爲何五四反傳統要「整體性」地反呢？林毓生解釋，這是因爲五四知識分子在他們的深層意識中，受傳統有機一元思維模式影響，把傳統看做一個有機的、不可分割的整體，又認爲傳統文化與現代化是互不相容的，因而「整體性」地批判傳統，繼而主張「全盤」打倒傳統。要指出的是，晚清知識分子跳不出儒學的框框，而五四知識分子則全盤地否定傳統。故「打倒傳統」是五四時期的一個特色。對林毓生來說，「打倒傳統」與五四知識分子希望中國建立起民主是背道而馳的。他認爲，儒學雖有別於民主，但兩者決非相互排斥。他因此提出了「創造性轉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的概念，主張通過這個方法把西方民主落實到一個已「轉化」的儒家中國中。所謂「創造性轉化」，是指使用多元的思考模式將一些中國傳統中的思想、價值、行爲模式加以重組與/或改造，使之變爲有利於變革的資源，同時在變革中得以繼續保持文化的認同。林毓生批評五四知識分子的「整體性的反傳統主義」，認爲中國錯過了一次推行真正民主的機會，正是由於他們這種激烈的思維模式所致。

打倒傳統是思想革命。現代中國的思想發展經歷了兩次革命：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革了儒家的命；第二次是毛澤東思想革了傳統及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命。這是從「思想內容」(thought contents)的角度看現代中國思想發展，突出了發展中「變革」一面：即從儒學強調「三綱」、「五倫」到五四強調「科學」、「民主」，再到毛澤東強調「階級鬥爭」。若換了用「思維方式」(mode of thinking)的角度看，則會察覺到現代中國思想發展呈現一貫性。爲何這樣說呢？原因是：儒家強調修身，新文化運動強調確立民主、科學、理性的世界觀，毛澤東思想強調要「紅」(即以階級的角度去看問題)，三者都是把人的意識(human consciousness)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三套傳統都認爲，改造人的意識(transformation of human consciousness)是推行一切政治、經濟、社會變革的先決條件。可見，現代中國思想發展也有「繼承」/「延續」的一面。

五四運動是中國愛國主義發展的里程碑：跨社會階層愛國運動與「整體性反傳統的愛國主義」的出現：

清末新政時期，不同形式的愛國運動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出現，包括：排滿運動、收復主權運動、1905年的杯葛美貨運動、1908年的杯葛日貨運動。五四運動則首次體現了學界與工商界，即城市居民的聯合反日、反軍閥政府的愛國運動。這是一次空前的、最廣泛的表達民族感情的運動。它以「民族國家」為效忠對象，不像以往以「宗室」、「種族」、「國君」為效忠對象。

五四愛國主義是一種極端複雜的、充滿矛盾的愛國主義。其矛盾之處可從兩方面講。首先，五四知識分子一方面傾慕西方文化，要「全盤西化」來救國，另一方面卻痛恨列強出賣中國的利益，要反西方。這種複雜、矛盾的心態，大概是當時不少知識分子欣然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因，因為它是反西方的一種西方學說。其次，五四知識分子一方面認識到非全盤打倒傳統不能救國，另一方面又知道全盤放棄固有的文化是不可能的事，故陷於痛苦、矛盾的心態中，並產生如林毓生所說的「中國意識的危機」(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基於「整體性反傳統」的五四愛國主義，可說是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一種愛國主義。

對五四運動的反思

五四運動開啓了中國人對傳統文化的全面反思，它帶給我們最寶貴的價值，應該是一種「批判性反思」的精神。站在繼承五四精神的立場上，我們也要對五四這個新傳統作嚴肅的反思。

研究五四運動的學者往往強調，新文化運動標誌著中國走上科學、民主之路。我們對五四運動作出反思就要問：為什麼科學、民主一直到現在只是被人叫喊的口號呢？可以說，科學、民主未能在中國植根，在某程度上是因為客觀環境起了負面影響。但我認為五四知識分子對待西方思想的態度，正是問題的關鍵。我的意思是：五四知識分子接受西方思想，乃基於一種功利的動機。五四新文化運動，原本是一場啓蒙運動，但運動發展下去變成是手段，救亡才是真正的目的。對於某西方學說，不是整套去理解和接受，而是擇其有用的部分，以圖達到救亡、富強的目的。故西方思想在輸入中國的過程中，已被扭曲。

五四倡導民主，但重點放在民主制度上（即民主的「用」而非民主的「體」），忽視民主的「包容」精神；看事物採用非白即黑的兩分法，肯定一切，否定一切，把世界的多樣性、複雜性約化爲一種簡單、絕對的理想主義。談民主，又鮮及法治。只講民主，不講法治，不是演變成「極權民主」，便是演變成「無政府主義式的自由」。彷彿只有蔡元培、胡適等極少數人真正深入瞭解民主。

五四又倡導科學，即求真的精神。但五四之後出現「科學崇拜」、相信「科學萬能」的現象，是郭穎頤所說的「唯科學主義」(scientism) (見 Daniel W.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郭穎頤著，雷頤譯：《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 (1900—1950)》，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 年)。

科學、民主，只是被人叫喊的口號，且與西方人所主張的科學、民主，有不同的理解。一般人認爲：近現代中國深受西方思想的影響。我們應重新檢討這個看法。深層次上來說，中國人受科學、民主的影響並不大，似乎一切外來思想輸入中國都會被「中國化」(Sinicized)，加添了中國的特色。

五四運動所產生的三大思想流派

五四運動產生了三大思想流派：

第一，自由主義民主(Liberal democracy)，代表人物有胡適。自由民主派厭惡軍閥政府，鄙棄政治活動，致力於學術研究和教育，故鮮有在中國政壇上發揮影響力；

第二，馬克思列寧主義(Marxism-Leninism)，代表人物有陳獨秀、李大釗，將會在第四講作詳細交代；

第三，新傳統主義(Neo-traditionalism)，即新儒家/學(Neo-Confucianism)，代表人物有梁漱溟，在此作些補充。

研究新文化運動的人，大多集中探討五四知識分子如何迎接新思潮、反傳統；儒學已走到窮途末路，除了是被人「打倒」的對象外，似乎沒有什麼值得一談。不錯，傳統國粹派面對「倒孔」狂潮，因未能提出任何新的儒學觀點，顯得一籌莫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孔」之激烈氣氛中，有一位年青教授卻能獨排眾議、力挽狂瀾，爲儒學重新

包裝，並突出其現代意義。他是首創東西文化比較研究法的梁漱溟；1920 年在北大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講演時，座無虛席。

梁漱溟第一次提出世界文化分三大體系：西洋、中國、印度，並闡明每個文化必按其「意欲」發展。他指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根本精神的」，故西方人具奮鬥態度，著眼解決問題、改造局面；「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故中國人隨遇而安，不去解決問題，祇尋求自我滿足；而「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故印度人具禁欲態度，傾向於根本取消問題或要求。舉個例子，若一間房子房頂破了滲雨，西方人會拆掉重建，中國人會修補，而印度人則根本沒意識到他們在一間滲雨的房裏。

梁認為，西方人勇於戰勝自然，發展科學，但過於追求物質慾望，引發了世界大戰。因此，「現今西方思想界已鮮明的要求改變他們從來人生態度；而且他們要求趨向之所指就是中國的路，孔家的路。」他大膽地預示：「質而言之，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重要的一點是：梁認為在中國歷史裏看到的並非真正的儒家，並非孔子的儒學，應重新審視，追求真正的儒學，為未來中國文化復興奠下基礎。1921 年，《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至 1929 年印第 8 版，可見其為學術界人士所重視。

第三講 南京國民政府「十年建設」的成敗得失 (1928—1937 年)

(一) 解決「政權合法性」(regime legitimacy) 的問題： 「訓政」及「建設」的實施

1928 年 10 月通過的《訓政綱領》：「軍政」時期的結束與「訓政」時期的開始

蔣介石爲了建立南京政權的合法性，宣稱國民政府的所有政策將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爲依歸。根據孫中山的革命理論，「國民革命」分三個階段完成：(一)實行「軍法之治」的「軍政」時期；(二)實行「約法之治」的「訓政」時期；(三)實行「憲法之治」的「憲政」時期。1928 年，北伐完成，結束了「軍政」時期。國民政府遂於是年 10 月通過《訓政綱領》，這標誌著「訓政」時期的開始。

所謂「訓政」，是由執政黨（國民黨）訓練國民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種權力，領導全國邁向地方自治，完成民主選舉，還政於民，最終實行「憲政」。理論上，「訓政」爲期六年。國民政府遂於 1934 年由立法院擬定《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並於 1935 年通過、1936 年 5 月頒佈。立法院原本打算在 11 月 12 日召開國民大會，議定憲法，但由於政局混亂，國大代表未能如期選舉完竣，故不得不繼續實行「訓政」，直至國共內戰的後期。

「訓政」與「建設」的關係

「訓政」與「建設」是相輔而行的。孫中山在《建國方略》表示：「夫革命之有破壞，與革命之有建設，固相因而至、相輔而行者也。今於革命破壞之後，而不開革命建設之始，是無革命之建設矣；既無革命之建設，又安用革命之總統爲？」他認爲，「軍政」時期是破壞時期，而「訓政」，是修復、「建設」時期。所謂「建設」，就是我們說的「現代化」。

孫中山的「建設」理想

孫中山的「建設」理想，可見於他的三部著作：

(1)《建國方略》，1917—1919年寫成，分〈行易知難（心理建設）〉、〈實業計劃（物質建設）〉、〈民權初步（社會建設）〉三個部分；

(2)《國民政府建國大綱》，1924年1月23日提交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審議，主要內容是規劃建設的程序和政府機構的設置；

(3)《三民主義》，1924年1—8月在廣州國立高等師範學校演講的筆記稿，經孫中山修改後印行，分〈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未講完）三個部分。

在《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中，孫中山扼要地提出「建設」最重要的三點：

(1)「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故對於全國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劃之各式屋舍，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

(2)「其次為民權。故對於人民之政治知識能力，政府當訓導之，以行使其選舉權，行使其罷官權，行使其創制權，行使其複決權。」

(3)「其三為民族。故對於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對於國外之侵略強權，政府當抵禦之；並同時修改各國條約，以恢復我國際平等、國家獨立。」

孫中山所主張的「革命建設」，就是要建立一個現代的、獨立的（擁有主權的）、民主的、經濟發達的國家。

（二） 充滿「內憂外患」的十年：南京國民政府所陷的困境

對「十年建設」作出評價之前，首先要明白南京國民政府長期面對各方挑戰，以致精疲力竭，嚴重影響到「建設」的推行。當然，政府不能完全推卸責任，諉過於人。我們應把主觀因素連同客觀因素一併考慮，才能做到評價公允。

對國民政府而言，威脅主要來自三方面：中國共產黨、地方軍閥（史家稱「新軍閥」或「地方實力派」）、日本。大家對中共、日本在當時的活動比較熟識。其實，「新軍閥」

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但一般課本少談，所以在這裏作較詳細交代。

「新軍閥」/「地方實力派」的威脅

軍閥割據格局的延續

蔣介石於北伐期間收買地方軍閥，取得快速的勝利，但結果後患無窮。直到 30 年代中期，蔣只直接控制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數省。軍閥割據格局延續。歷史學家稱南京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地方軍閥為「地方實力派」或「新軍閥」。著名的有：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廣東的陳濟棠；雲南的龍雲；四川的劉湘；新疆的盛世才；華北、西北的馮玉祥；山西的閻錫山，以及東北的張學良。

蔣介石認為要真正掌握權力，首要的是裁軍。1928 年，蔣召開全國編遣會議以達裁減地方軍隊數目之效，引起不滿。1929 年，「新桂系」進攻湖南，被趕回廣西，但未被消滅。大局未定，北方馮、閻又興兵，1930 年發生「中原大戰」，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領導「改組派」加入，在北平建立新政府，直至張學良率領東北軍入關助蔣，事件才告平息。1931 年，蔣介石軟禁國民黨右派領袖胡漢民，各反蔣勢力雲集廣州，成立「廣州國民政府」。雖然該政府於 1932 年瓦解，但兩廣及後「半獨立」，直到 1936 年止。1933 年，福建又成立「人民政府」。西南及西部多省亦到紅軍長征時因受到威脅才歸順中央政府。「南京十年」(1928—1937 年) 的大部分時間裏，蔣介石並未真正地控制到全國，只有名義上的統一。

其實，蔣介石最大、最終的願望是統一中國。他未能統一中國，是因為他沒有能力同時剷除所有「地方實力派」。只要他企圖這樣做，所有政敵就會聯合起來搞掉他。為了分化敵人，蔣只能使用拉一派、打一派的方法。對他有利的是，各方矛盾錯綜複雜：反蔣集團除了一致反蔣外，幾乎沒有共同目標可言。無怪 20 世紀 30 年代的中國仍然陷於權力分散(decentralization)、地方分離(separatism)、勢均力敵(equilibrium of fragmented military forces)的局面。這明顯是 20 年代軍閥割據格局的延續。

為何歷史學家把 1928 年設為「軍閥割據時期」的下限？

既然軍閥割據的格局延續到 30 年代，歷史學家為何把 1928 年設為「軍閥割據時期」的下限呢？這是因為「法統」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在北伐完成後最終得到解決。在此之前，只有列強承認北洋政府為中國的合法政府，各地軍閥和黨派都不承認它的合法性。北伐結束了這個局面。很多地方軍閥參加北伐後，成了國民黨黨員，並以孫中山忠實信徒自居。他們自然承認南京國民政府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因而把「三民主義」奉為圭臬。

然而，這並不代表 1928 年後的「地方實力派」真的追隨蔣介石。每當南京的政策違背他們的權益時，就起來反對蔣介石，說蔣背叛了孫總理的「三民主義」，非打倒不可。他們甚至會另起爐灶，建立新的國民政府與南京分庭抗禮，只不過他們針對的是蔣介石本人而已。

「新軍閥」對國家「建設」的影響。

地方與中央不同形式的對抗（從陽奉陰違到兵戎相見），對國家「建設」自然有不良的影響。而地方財政獨立則嚴重打擊中央財政收入，對中央政府的影響最大。當時地方稅收分國稅、省稅兩類；田賦歸省稅。各省所收國稅，例應繳交中央，但由於各省浩大的軍費開支，訂定為國庫支付，故各省少有盈餘上繳中央。

南京國民政府只靠其直接控制的數省提供稅項，幸好長江三角洲是中國最富庶的商業中心，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中央政府主要稅收有：關稅 (48.5%)、鹽稅 (22%)、商品稅 (12.6%)，合計佔總稅收 83.1%。中央政府主要開支是：軍費 (46%)、歸還債、息 (34%)，合計佔總開支 80%。可見在經常預算中能用於「建設」的款項極少。須知，政府當時的確大搞建設。資金從何處來呢？原來，每辦一項「建設」，政府都開徵新稅，這當然加重人民的負擔。

「新軍閥」與地方「建設」

不少 30 年代的「新軍閥」是史家所稱的「改革派軍閥」(reformist warlords)。他們在其管轄的範圍內大搞「建設」，力圖將自己的地盤變成「模範省」，與蔣介石一比高下。

較爲突出的例子有：陳濟棠搞的「廣東省三年施政計劃」；新桂系搞的「廣西建設運動」；閻錫山搞的「山西十年建設計劃」；韓復矩搞的「山東鄉村建設運動」。

「新軍閥」明白公路對運輸與軍事部署的重要性，於 30 年代大力發展公路網。直至今日，中國仍沿用了當時的公路網。「新軍閥」又爲了擴充經濟實力與中央抗衡，往往在其所據地盤內興辦實業，客觀上對地方經濟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的威脅

下一講將會詳細介紹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崛興，這裏只談蔣介石對中共的態度。無可否認，蔣視中共爲頭號敵人；他因此在 1930—1934 年間發動 5 次「圍剿」中共根據地的戰爭。面對日本與中共的威脅，蔣的既定政策是「先安內後攘外」。1933 年 4 月，他在江西省會南昌對部下解釋說：日本只是「皮膚小病」，中共才是「心腹之患」。我們有理由批評蔣介石不及早抵抗日本的侵略，但應當承認他有先見之明，明白能打垮他的不是日本，而是共產黨。其後事實證明他的看法是對的，1949 年令其下臺的正是共產黨。

日本的威脅

蔣介石在日本策動「九·一八事變」後備受抨擊，怪他不及早抵抗日本侵略。蔣也許有他的原因。除了想先消滅共產黨外，蔣大概認爲中國還未準備好與日本開戰，兼且明白到大規模的戰爭將會帶來巨大的災害、摧毀許多建設好的現代化設施。蔣不對日本開戰的確失去了一次團結全國人民的機會，但八年抗戰的史實證明打仗要付出巨大的代價。蔣又於全面戰爭爆發前反對中國單方面廢除不平等條約，觸怒了不少愛國人士。他也許知道要與西方列強保持良好關係，因爲日本一旦發動戰爭，他要靠這些西方盟友的幫助。事實證明他這樣做是有理的。

上述說法並非要維護蔣介石，只是想說明一點：我們無須認同蔣的行爲，甚至可以強烈批評它，但我們不應因此而否定它有合理的一面。蔣對日本步步進逼沒有還擊，這不能證實他沒有愛國心；他也許有自己的一套考慮。我認爲：歷史學家的工作不是說教，

而是解釋已發生的事為何就是如此般發生 (In my opinion, the task of a historian is not to moralize, but to explain why things had happened in the way they did)。我們應嘗試用當事人的角度去看問題，可以更好地理解看似不合常理的事，更好地理解歷史。重要的一點是嘗試去明白，但明白後卻不一定要同意或接受 (To understand does not predispose one to agree or to accept)。

(三) 「十年建設」的回顧與分析

政治方面

就政治方面的建設而言，國民黨實行「以黨治國」。現分析當時黨、政系統建構的成效。整體來說，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皆具備現代政黨和現代政府的模式，但兩者都未能發揮整合(integrate)國家的功能。

黨的建構

國民黨早於 1924 年 1 月在孫中山領導下改組，確立了全國代表大會制度。理論上，國民黨的最高權力機關是全國代表大會；由它選出中央執行委員會，再選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另外設有中央政治會議 (又稱中央政治委員會)，是孫中山於 1924 年 6 月成立的最終決策機關 (見第四講)。它在組織上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附設機構，成員亦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推定，但人選不一定限於中央委員。其對立法原則、施政方針以及政務官的任命等等，皆有議決之權；決議直接交國民政府執行。

國民黨在 1928—1937 年間未能發揮整合國家的功能，是由於其組織與運作皆有嚴重缺陷：

第一，國民黨缺乏群眾基礎。它從未致力吸收基層人士，故其黨員只局限於上層社會的精英分子。黨員的地理分佈顯示他們來自某些城市和地區 (主要是「剿匪區」)。國民黨只在 11 個省，6 個城市和 348 個縣 (全國有 1,890 個縣) 設有黨支部；

第二，國民黨由於資金不足，不重視訓練新加入的黨員，直接影響黨員的質素；

第三，黨中央與省市黨支部溝通不足；

第四，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這可說是最大問題。

國民黨內部派系可劃分為兩大類別，每類又可分為若干派：

第一類是不滿蔣介石的派系，有：

(1) 國民黨右派，以胡漢民為首。1928—1930年，蔣介石拉攏國民黨右派牽制國民黨左派。到1931年2月，胡因堅持反對召開國民會議及制定「訓政」時期之約法，被蔣囚禁於南京湯山，導致蔣與右派決裂。

(2) 國民黨左派，以汪精衛為首。1931—1937年，蔣介石拉攏國民黨左派牽制國民黨右派；

(3) 「地方實力派」，包括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馮玉祥、閻錫山等主要人物。有關他們與蔣之間的關係，可見前面「軍閥割據格局的延續」一節。

上述派系領袖不乏資深革命黨員，有些還追隨孫中山搞革命。他們挑戰蔣的領導地位，懷疑蔣是否適合繼承國民黨的革命傳統。蔣因此感到極度不安。

第二類是親附蔣介石的當權派系，有：

(1) CC系(CC是Central Club的縮寫，即「中央俱樂部」)，以陳果夫、陳立夫為首，又以組織部為其大本營。成員多文職出身，控制省市縣黨政組織，又指揮特工系統，掌管宣傳。他們擁護蔣介石為至高無上的領袖，堅決反對共產主義、帝國主義，提倡恢復傳統道德。

(2) 黃埔系，以戴笠、賀衷寒為首，成員皆黃埔軍校出身之嫡系將領。他們隸屬不同名稱的組織——力行社、革命青年同志會、中華復興社、藍衣社、鐵血團，用法西斯手段消滅反蔣人士，以鞏固蔣的權力。又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工業國有化、徵兵制。戴笠掌鐵血團，為特工、暗殺組織；賀衷寒掌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專派人滲入地方軍隊搞破壞。黃埔系因插手宣傳、文化、出版，與CC系產生矛盾。

(3) 政學系，由不同背景出身的人組成，有軍人(黃郛、張群、熊式輝等)、知識分子(楊永泰、王寵惠等)、銀行家和工業家(吳鼎昌、張嘉璈等)。他們沒有追隨者、組織、政治綱領。大家有興趣的是追求權力、財富、地位，因此與CC系、黃埔系有利

害衝突。

值得注意的是，派系鬥爭不是蔣介石製造出來的。它是中國政治的一個組成部分。蔣善於玩弄權術：收買、恐嚇、分化、拉一派、打一派，這是他的拿手好戲，是他在政海中生存的策略。他別無選擇。正如 Guy Alitto (艾愷) 說：“China’s political arena at the time was a veritable sea of particularistic relationships, from patronage networks to cliques. Those significant political actors that emerged and survived did so because they could swim in it. [Condemning Chiang Kai-shek (Jiang Jieshi) for playing with factionalism] is the equivalent of condemning the strongest swimmer for swimming! The only alternative Chiang (Jiang) had, after all, was to drown, as many of his fellow political figures in fact did” (Guy Alitto, “Chiang Kai-shek in Western Historiography”, *Proceedings of Conference on Chiang Kai-shek and Modern China*, Vol. 1, Taipei, 1987)。無可否認，蔣玩弄權術的結果是進一步激化派系鬥爭，使國家統一難於實現。還有，蔣為要保住權力，只能容忍黨內各派貪污、腐敗的存在，以換取它們的支持。可以說，這是當時中國政治的悲哀。

中央政權的建構

南京國民政府體現了孫中山倡議的五權分立制度，即五院制——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可惜這些負責執行「治權」的機關未能真正「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

現以考試院為例說明問題。考試院分兩個部門：考選委員會、銓敘部。政府招聘條例規定：公務員必須通過考試合格才能錄用。1928—1937 年間，考選委員會舉辦過高考 3 次、普考 11 次、特考 6 次，共計 20 次。只有 8% 考生合格，亦不是所有合格者獲錄用。其實，少於 1% 公務員通過考試合格，公務員的聘任與升職都是由銓敘部決定的，這反映出南京政權「制度化」程度低，不脫「人治」本色。

權力高度集中：權力中心究竟在哪裏？

理論上，國民政府總攬「政權」，但由於南京政權實行「以黨治國」，其主要官員（包括國民政府主席、委員，五院院長，各部、會首長）都由國民黨推薦出任；他們必須執

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定。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有趣的是，其成員人數不斷地增加：從 1924 年的 24 人增至 1926 年的 36 人、1931 年的 71 人、1935 年的 119 人。這是蔣介石用崇高的職銜來換取政敵支持的結果。中執會成員人數增加並不意味著它的權力上升；實際上，中執會的權力不斷地下降，其成員雖享有地位，但越來越無實權。

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會）亦只有孫中山在世時把它作為最終決策機關。它在南京國民政府主政時期沒有實權。

至於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理論上只能執行中央執行委員會或中央政治會議的決定，但實際上常常由其主席蔣介石基於軍事形勢考慮作出重要決定。蔣親身督師「剿匪」後，則常以「剿匪總部總司令」的名義就地作出重要決定，南京方面只是形式上通過其決定而已。可見民初以來政治軍事化的現象仍然持續。

實質上，南京國民政府是蔣介石的個人獨裁、一人專政。他相信武力是解決問題的最佳選擇和推動中國現代化的槓杆，又缺乏法治和法定程序的觀念和意識。因此，蔣在政治決策中出現高度的個人化和隨機性。

經濟方面

在發展經濟方面，無可否認南京國民政府作出了很大貢獻。

奠下現代經濟基礎結構

1928—1937 年間，中國的現代經濟部門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這實有賴南京國民政府為現代經濟發展鋪設了許多基礎設施。政府在這方面的努力包括：

- (1) 確立現代銀行體系，成立：
 - (a) 中央銀行，負責保持貨幣穩定；
 - (b) 中國銀行，負責外匯管理、發展外貿；
 - (c) 交通銀行，負責協助國內工業、企業。

政府還批准這三家銀行無限地買賣外匯以穩定匯率，令政府銀行第一次

控制外匯。另外成立的還有中國農民銀行，負責農村信貸和土地抵押業務。商業銀行數目也不斷增加：從 1927 年的 57 家增至 1934 年的 138 家、1936 年的 146 家；

- (2) 統一幣制：1933 年 3 月通過《銀本位鑄造條例》，廢兩改元 (0.715 上海兩兌換 1 銀元)；1935 年 11 月放棄銀本位，用「法幣」，可直接兌換外國貨幣，對工商業及貿易發展有很大裨益；
- (3) 統一度量衡：採用「米制」(metric system)；
- (4) 改善、發展交通、運輸體系：
 - (a) 擴建鐵路網絡：從 1928 年的 8,000 公里增長至 1936 年的 13,000 公里；東西主幹線隴海鐵路於 1934、1935 年分別延伸到西安、寶雞；中南主幹線粵漢鐵路於 1936 年竣工兼全線通車；
 - (b) 擴建公路網絡：從 1921 年的 1,000 公里增長至 1936 年的 115,703 公里；
 - (c) 發展國內航空事業：分別於 1930、1931、1933 創辦中國、歐亞、西南航空公司；
 - (d) 擴展郵政業務：郵路從 1921 年的 400,000 里增長到 1936 年的 584,800 里；
 - (e) 擴展電訊業務：長途電話線從 1925 年的 4,000 公里增長到 1937 年的 52,200 公里。

發展工商業

有利工商業發展的因素包括：

- (1) 列強同意廢除關稅限制；
- (2) 國民政府飭令廢除厘金；
- (3) 國民政府實業部、資源委員會聯合民間資力，設立示範工廠——紙廠、工業酒精廠、植物油加工廠、煉鋼廠、機器製造廠、電器用具製造廠等，帶動工業發展；
- (4) 國民政府制訂新政策——免除原料和出口稅、減低鐵路運輸費、發放現金獎

勵、給予專利權、通過交通銀行提供低息貸款，鼓勵私人投資發展實業；

(5) 民間發起杯葛日貨運動；

(6) 國民政府提倡國貨運動。

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是有關南京國民政府與資本家的關係。這裏特地提出這個問題來討論，是因為從 20 世紀 30 年代直到 70 年代，一般人（尤其是政治評論員與學者）都把南京政權定性為一個「資產階級政權」（a capitalist or bourgeois regime），即是認為南京政權代表資本家的利益、為資本家的利益服務。這個看法主要基於四個原因：

第一，上海資本家於北伐期間支持蔣介石；

第二，掌管財政的宋子文與孔祥熙二人與資本家有密切的關係；

第三，蔣介石與資本家皆強烈反共；

第四，受馬克思學說影響，認為任何政權都有階級基礎；南京政權既與資產階級的關係最密切，它很明顯是一個「資產階級政權」。

上述看法到 80 年代受到質疑。一些專門研究南京政權性質的美國學者提出了新的看法，其中較具代表性的三種觀點如下：

第一，認為南京政權是一個「自主政權」（an autonomous regime）：指出南京國民政府不為任何階級服務；它只謀求自己本身的利益，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勢力（見 Parks Coble,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第二，認為南京政權是一個「多元化政權」（a pluralistic regime）：指出南京國民政府同時兼顧不同階級的利益，故其對各階級的政策常常出現矛盾（見 Richard Bush, *The Politics of Cotton Textiles in Kuomintang China, 1927-1937* (New York: Garland Publications, 1982); Bradley Geisert, *Power and Society: The Kuomintang and Social Elites in Kiangsu Province, China, 1924-1937*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Microfilm International, 1986)）；

第三，認為南京政權是一個「專制協合政權」（an authoritarian corporatist regime）：指出南京國民政府強調階級調和，但缺乏明顯的意識形態（見 Joseph Fewsmith,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 1890-193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三種較新的觀點都不認同南京國民政府專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那麼，我們應如何看待蔣介石與資本家的關係呢？我認為蔣介石一直視資本家為合作夥伴，但要他們絕對服從政府的指令。他特別緊張資本家的動向，是因為政府靠他們提供龐大的經費。實際上，蔣與資本家的關係取決於資本家是否聽從政府的指令。所以他對資本家軟硬兼施，政策搖擺不定。

總之，蔣不允許任何階級或階層建立起獨立的權力基礎，以防止敵對勢力出現。這包括農民、工人、地主、資本家和知識分子。

改良農業

農業方面進行了改良。南京國民政府在這方面的努力包括：

- (1) 組織中央農業推廣委員會，致力普及農業知識、改進生產方法、促進農民合作；
- (2) 成立中央農業實驗所，進行各種農業改良試驗；
- (3) 成立全國稻麥改進所，從事稻麥的改良與推廣；
- (4) 組織農村復興委員會，輔助農村建設；
- (5) 在全國經濟委員會下設水利委員會，統一水利行政。

社會方面

現代教育制度的確立

南京國民政府強調實用課程：大學注重理工科；中學注重職業訓練；小學注重勞作訓練。此外注意發展社會公民教育，鼓勵公私費出國留學。

新生活運動的推行

1934 初，眼看第五次「圍剿」快要取得勝利，蔣介石便在江西南昌發起一場「新生活運動」，並通過不同形式的公共媒介向全國推展開來。運動主要針對兩種思想和信

念：共產黨主張的階級鬥爭，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宣揚的反傳統和個人主義。爲了確立一套有利其統治的信仰行爲模式，蔣要求國民生活規律化和軍事化，即是要養成衛生健康、勇敢迅速、刻苦耐勞、信守諾言、禮貌待人等習慣。蔣又認爲真正的軍事化，乃植根於「禮、義、廉、恥」，故須全面恢復傳統美德來建構「一種新的民族意識與群眾的心理」，以達成「中國的社會新生」。運動的主旨，可見於《新生活運動綱要》和《新生活須知》這兩個刊物。1934—1935 年間，運動由南昌的軍事領袖領導；1936 開始由蔣夫人及教會人士在南京領導。新生活運動因流於繁瑣及形式化而收效甚微。有時人譏諷它是一場「復古」運動。

土地改革的失敗

南京國民政府爲了改善租佃關係，曾經提出過一項「二五減租」政策。所謂「二五減租」，即佃農先得每年收獲的 25%，剩下之 75%由佃農和地主平分，地主得 37.5%，故又名「三七五減租」。該政策只在浙江推行有些成績，其他地區功效甚微。

有論者認爲，蔣介石之敗北，是因爲他沒有如毛澤東那樣去策動群眾、搞土地革命，結果失去廣大農民的支持。但我們不能希冀蔣介石推行激烈的土地革命。他雖未能統一中國，但始終是統治者，自然反對破壞安定的群眾運動。蔣也許有先見之明，知道群眾運動是奪權的有效工具，但不利於國家的建構(state building)。毛澤東時代一連串的群眾運動導致天下大亂，證明蔣是對的。

南京國民政府推行現代化的模式

南京國民政府所選擇的現代化模式，主要是基於「三民主義」理論，並吸取了蘇俄、德國、日本的現代發展經驗。它是一種：

- (1) 以國家集權和工業—軍事一體化爲主導的、自上而下的現代化；
- (2) 以資產階級爲骨幹和強調自由市場作用的、同時帶有強烈的國家資本壟斷經濟色彩的現代化；
- (3) 主要在通商口岸發展起來的、沒有整體的農業產業化發展政策的現代化。

(四) 值得探討的問題

有關「十年建設」的成效

至於「十年建設」的成敗得失，論者意見不一。有人說南京國民政府在 1928—1937 年間的表現可稱得上是「黃金十年」(the golden decade)，亦有人說這十年所體現的是「流產的革命」(the abortive revolution)。

「黃金十年」一說，見 Paul K.T. Sih (ed.), *The Strenuous Decade: 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s, 1927-1937* (New York, 1970)；薛光前：《艱苦建國的十年》，臺北正中書局，1971 年。

「流產的革命」一說，見 Lloyd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易勞逸：《流產的革命：1927-1937 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 年。

有關南京政權的性質

以下形容詞可供借鑒和參考：

現代的 (modern)；

傳統的 (traditional)；

儒家的 (Confucian)；

基於人際關係的 (personalistic) / 人治的 (rule by man)；

精英的 (elitist)；

極權的 (totalitarian)；

專制的、相信威權主義的 (authoritarian)；

一黨專政的 (one-party dictatorship)；

一人專政的 (one-man dictatorship)；

法西斯的 (Fascist)；

軍事化的 (militaristic) ；

資產階級的 (capitalist) ；

「自主的」(autonomous) ；

「多元化的」(pluralistic) ；

「專制協合的」(authoritarian corporatist) 。

有關「十年建設」時期中國經濟、社會的性質：

以下形容詞可供借鑒和參考：

傳統的 (traditional) ；

現代的 (modern) ；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 (semi-feudal semi-colonial) ；

農業的 (agrarian) ；

商業的 (commercial) ；

工業的 (industrial) ；

勞力密集的 (labour-intensive) ；

資本密集的 (capital-intensive) 。

要注意的是：

上面每一個形容詞都適用於說明當時政權、經濟或社會的性質，但那個（那些）形容詞最（較）貼切則可謂見仁見智。最要緊的是能夠拿出相關史實來支持所選用的某一個或某數個形容詞。有些形容詞是相互矛盾的，如「現代的」與「傳統的」、「勞力密集的」與「資本密集的」便是。為什麼它們可以被選用來描述同一個現實的性質呢？理由是每一個歷史實際都是錯綜複雜、充滿矛盾的。20世紀20、30年代的中國更是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傳統與現代因素並存不足為怪。例如，當時中國的政治制度是「現代的」，但政權或管治的本質還是「傳統的」，因為它是「專制的」和「基於人際關係的」，是「人治」。經濟、社會結構亦如是：通商口岸是「現代的」，其生產方式是「資本密集

的」；但內地農村是「傳統的」，其生產方式是「勞力密集的」。這正好反映出中國在現代化的歷程中有「變革」的一面，也有「延續」的一面。

第四講 中國共產黨的崛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1921—1949 年)

(一) 陳獨秀、李大釗與中國共產黨的創立 (1921 年)

中國共產黨於 1921 年成立，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作為其理論基礎的政黨。而馬克思主義是闡釋資本主義社會裏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的理論。新文化運動初期，較少人注意到馬克思主義，這大概是因為當時中國尚非資本主義社會、工業社會；資本家、工人人數不多。為何馬克思主義在三數年間就吸引了許多先進的知識分子？我們試從中國共產黨的創辦人陳獨秀、李大釗二人的心路歷程看五四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原因。

新文化運動開展時的陳獨秀和李大釗

新文化運動開展時，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他創辦了《新青年》，領導「文學革命」和「打倒孔家店」，並鼓吹科學（「賽因斯」science）與民主（「德莫克拉西」democracy）。當時他主張的是英美式的民主。（詳情見第二講「五四運動」一節。）

而李大釗當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和教授。其哲學思想體現了道家的世界觀，但由於受到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故有積極、進取、樂觀的一面。他相信「宇宙無盡，無初無終」，認為「今」最寶貴，提倡「青春中華」的創造。

1916 年 9 月，李大釗發表〈青春〉，把希望寄託於青年。他寫道：「吾願吾親愛之青年，生於青春死于青春，生於少年死于少年也。……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進前而勿顧後，背黑暗而向光明，為世界進文明，為人類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資以樂其無涯之生。」

1918 年 4 月又發表〈今〉，說道：「無限的『過去』都以『現在』為歸宿，無限的『未來』都以『現在』為淵源。『過去』、『未來』的中間全仗有『現在』以成其連續，

以成其永遠，以成其無始無終的大實在。……這就是過去未來皆是現在的道理。這就是『今』最可寶貴的道理。」

可見新文化運動初期，陳、李二人似乎和馬克思主義拉不上關係。

陳獨秀、李大釗評論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1918—1919年

陳獨秀在 1918 年 3 月的〈駁康有為《共和平議》〉中首先提到俄國革命的重大歷史意義：「二十世紀俄羅斯的共和，前途遠大，其影響於人類之幸福與文明，將在十八世紀法蘭西革命之上。」原來陳把革命和革命的理論基礎分開看；他在表示歡迎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同時，卻對該革命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學說表示懷疑。這可見於他在 1918 年 12 月的《每週評論》中所講的話：「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今日已經沒有根據了，所以他的勢力在[德國]國會上也漸減少。」

1919 年底，陳獨秀聽了胡適的老師杜威(John Dewey)在北大講授民主，對民主有更深入的理解，並在此刻仍堅持自己對民主的信念。他在 1919 年 12 月的〈實行民治的基礎〉中寫道：「中華民國的假招牌雖然掛了八年，卻仍然賣的是中華帝國的藥，中華官國的藥，並且是中華匪國的藥。……我們現在要實行民治主義，是應當拿英美做榜樣。……我們不情願階級鬥爭發生，我們渴望純粹資本作用——離開勞力的資本作用——漸漸消失，不至於造成階級鬥爭。」

有趣的是，李大釗對俄國爆發革命作出了同樣的反應；他一方面表示歡迎布爾什維克革命，另一方面卻不認同作為布爾什維克革命哲學基礎的唯物主義。

他在 1918 年 11 月的〈Bolshevism 的勝利〉中提到：「Bolshevism 這個字，雖為俄人所創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精神。所以 Bolshevism 的勝利，就是二十世紀世界人類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新精神的勝利。」可見他用自己的觀點去理解布爾什維克革命。

他又認為精神與物質同等重要，不應像馬克思主義那樣強調物質第一性。1919 年 5 月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裏面寫道：「我們主張以人道主義改造人類精神，同時以社會主義改造經濟組織。不改造經濟組織，單求改造人類精神，必致沒有效果。不改

造人類精神，單求改造經濟組織，也怕不能成功。我們主張物心兩面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平心而論，馬氏的學說，實在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在馬氏時代，實在是一個最大的發見。我們現在固然不可拿這一個時代一種環境造成的學說，去解釋一切歷史，或者就那樣整個拿來，應用於我們生存的社會，也卻不可抹煞他那時候的價值，和那特別的發見。」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來說，當時的李大釗是一個唯心主義者。

從蘇俄傳來的新信息，1920年

1920年出現了兩個新動向，致使一些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

其一是1920年4月「加拉罕對華宣言」(Karakhan Declaration)首次在中國公開。它歷史性地宣布蘇俄將無條件放棄沙俄在華所奪取的一切權益。儘管蘇俄沒有立刻履行諾言(及後「宣言」並沒有落實)，但這項舉動卻與西方列強剛在凡爾賽和會出賣中國利益之舉形成了反差。不少中國知識分子因此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開始改變。

其二是1920年7月列寧提出了「殖民地與半殖民地革命」理論。它為「半殖民地」中國的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具體的救亡行動綱領：中國革命須分兩個階段進行，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這個具體的反帝國主義「兩次革命」論滿足了正為救國迷惘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期望。

陳獨秀、李大釗成爲馬克思主義的忠實信徒

從1920年秋天開始，陳獨秀、李大釗對蘇俄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轉變，而且很快便成爲馬克思主義的忠實信徒。

陳獨秀在1920年9月寫的〈談政治〉中說：「若不經過階級戰爭，若不經過勞動階級佔領權力階級地位的時代，德莫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的專有物。……我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創造那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爲現代社會第一需要。」

在1920年12月的〈民主黨與共產黨〉中，陳又寫道：「民主主義是什麼？乃是資本階級在從前拿他來打倒封建制度的武器，在現在拿他來欺騙世人把持政權的詭

計。……資本和勞動兩階級未消滅以前，他兩階級的感情、利害全然不同，從那裏去找全民意？」

李大釗在 1920 年 12 月的〈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中提出：「從前的歷史，專記述王公世爵紀功耀武的事。史家的職分，就在買此輩權勢階級的歡心，好一點的，亦只在誇耀自國的尊榮。……唯物史觀所取的方法，則全不同。他的目的，是為得到全部的真實。……這不是一種供權勢階級愚民的器具，乃是一種社會進化的研究。」似乎他無條件地接受了唯物論，對一年前自己提出的許多疑問則不了了之。

從陳、李二人的言論可得悉在短短一年內他們完全改變了自己的觀點。這反映出二人是為了解救的目的——即出於功利的動機去接受馬克思主義。其實，他們所接受的，並非強調無產階級革命的經典馬克思主義，而是強調反帝國主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即經過列寧改造的馬克思主義（註：馬克思列寧主義可說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Marxism-Leninism is “Marxism in the era of Imperialism”）。本來，接受馬克思主義理應是為了解工人階級獲得更多的利益，但當時陳、李等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目的卻不是那樣；他們所接受的只是列寧突出的帝國主義階段的馬克思主義。當然，在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後，二人亦欣然接受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

這一過程體現了五四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接受西方的學說，是出於救亡的功利動機。由此看來他們在短時間內完全改變觀點是可以被理解的。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1921 年 7 月）

由於蘇俄受到西歐各國孤立和敵視，列寧開始將注意力轉移到亞洲。眼見中國知識分子似乎非常擁護馬列主義的革命理論，列寧遂派第三共產國際（以後簡稱「第三國際」Comintern）東方局代表維丁斯基（G.N. Voitinsky）來華支援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 1921 年 7 月舉行。這表示中國共產黨正式誕生。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了由不在場的陳獨秀當選中央局書記。大會議決堅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因此對其他政黨（包括國民黨）持敵對態度；又派代表去莫斯科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

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並議決：參加第三國際，成為它的支部；接受「兩次革命」理論，確認「反帝國主義」及「反封建主義」為現階段革命之目標，奠下與國民黨合作的基礎。

以下分四個部分闡述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第一次國共合作（1923—1927年）、國共鬥爭（1927—1937年）、第二次國共合作（1937—1945年）、國共內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1946—1949年）。

對每個部分逐一加以說明之前，先著重地提出兩個有關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第一、運動是否一帆風順、持續擴張？第二、運動是否一直由毛澤東領導？在此提醒大家注意這兩個問題是有道理的。歷史學家往往因事後看問題而影響了他們分析事物的客觀性。1949年，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打敗了執政的國民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事實，直接影響了一般學者對整個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看法。

首先，由於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一般學者都將注意力集中在共產黨如何取得勝利，往往忽略了1921到1949年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起伏和波折。從1921到1927年，共產主義運動藉國共合作而持續擴張；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陷入了低潮。1930到1931年，共產黨在華中地區成立了許多蘇維埃根據地，再次擴張；但由於蔣介石進行「圍剿」，共產主義運動於1934到1936年又轉入低潮。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黨撤退到四川，而日本軍隊只能控制沿岸及鐵路沿線地區，因此共產黨得以在廣大農村腹地擴建抗日根據地。1939到1941年，日本軍隊全力掃蕩華北抗日根據地，使共產主義運動再次陷入危機中。直到1944年，共產黨才開始重新擴張勢力。抗戰勝利後不久內戰爆發，起初國民黨軍隊勢如破竹、所向披靡，直到共產黨於1947年7月開始全面反攻，形勢才急轉直下，最後共產黨取得勝利，國民黨敗北遷臺。事實基本如此。

其次，由於1949年共產黨的勝利標誌著毛澤東領導的革命獲取勝利，而毛澤東本身表示革命是農民的革命，因此許多學者聚焦於共產主義運動中毛澤東領導的農民革命，而忽略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複雜性。當時中國的共產主義者主要分為兩個派別。其一聽命於第三國際，主張在城市進行革命；另一派由毛澤東領導，主張在農村進行革

命。其實，從 1921 年到 30 年代中期紅軍長征，第三國際都直接影響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期間毛澤東曾遭到排斥，長征中途的遵義會議，才再次得到認可。直到 1942—1943 年在延安進行整風運動，他的權威領導才得以樹立，這是事實。

(二) 第一次國共合作 (1923—1927 年)

1919 年 3 月，列寧成立第三共產國際，推廣共產主義運動。眼看 1921 年 7 月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力量非常薄弱，第三國際便致力在中國尋找一個較有影響力的政黨來與中國共產黨合作。

國共合作的醞釀與「聯俄容共」政策的制定 (1923 年)

第三國際和孫中山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醞釀中擔當了重要的角色。

1921 年，第三國際派馬林(H. Maring)到桂林聯繫孫中山；翌年又派達林(S.A. Dalin)與越飛(Adolf A. Joffe)分別到廣州和上海與孫會面。由於孫中山的革命事業正陷於低谷，他因此對布爾什維克黨組織及紅軍深感興趣。1922 年 6 月廣東軍閥陳炯明叛變，對他打擊尤大，遂決定接納第三國際的建議，制定了「聯俄容共」政策，為第一次國共合作打下基礎。

要注意的是孫中山的「容共」政策規定中共黨員必須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換言之，所謂「國共合作」並非兩黨平等地合作，而是要中共黨員承認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地位。1923 年 1 月 12 日，第三國際向中共發出「一月指示」，務使它依照孫中山提出的方式進行合作。其實，中共中央局書記陳獨秀是不贊成「容共」政策的。他恐怕這種合作方式會危害黨的獨立性和黨員的階級性。他又承認「祇不過是因為第三國際的壓力，中國共產黨才勉強承認在國民黨內開展活動的必要性。」陳為了服從第三國際的指示而執行違背自己意願的政策，可說是「黨性」的具體表現。

在中共接受了「黨內合作」形式之後，孫中山與越飛遂於 1923 年 1 月 26 日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指明中國目前不適宜實行共產主義或蘇維埃政體。這符合孫中山的

願望。另一方面，蘇俄對中國政局的影響從此大增。第三國際立即派來鮑羅廷(Mikhail Borodin)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又派來格林(Galen)助孫中山訓練一支黨軍，1924年於廣州成立黃埔軍校，蔣介石成爲第一任校長。

國民黨改組與分裂 (1924年)

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會上宣布改組。一般歷史學家認爲，鮑羅廷在國民黨改組一事上影響最大。無可否認，這次改組是以蘇聯之組黨方式爲依歸的。但孫中山亦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使改組後的國民黨符合他本人的意願。

大會確定孫中山爲總理。新黨章規定：總理爲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主席，有最終決策權。這使總理權大於黨。值得一提的是，出席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半數成員及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所有成員都經孫中山親手挑選。孫又於同年6月創立政治會議(或稱中央政治委員會)。它應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個附設機關，但實際上有權先斬後奏，所以它的權力大過中央政治委員會。孫中山領導革命經過幾次失敗後，意識到作爲國民黨的領袖必須掌握大權。國民黨改組後，孫儼如黨的獨裁者。

另外，國民黨一大確定了「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這使國民黨成爲一個與下層社會有廣泛聯系的革命政黨。此時孫中山認爲群眾應成爲革命的積極參與者，因此又在中央成立了農、工、婦女、青年、宣傳等部門，由中共黨員領導。

孫中山終於掌握了實權，但是派系鬥爭也開始了。國民黨爲何分裂？基本原因是國民黨黨員對「聯俄容共」政策產生分歧。其中部分高級黨員(如中央監察委員會之張繼、鄧澤如、謝持等人)基本上反對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成爲國民黨右派。他們因避免公開批評孫中山，故把矛頭指向共產黨。1924年6月，右派彈劾中共黨員破壞合作，違反《孫文越飛聯合宣言》的精神。而國民黨另一些高級黨員(如汪精衛、廖仲愷等人)則支持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成爲國民黨左派。要注意的是，國民黨左派成員並非中共黨員，他們只是依孫中山的主張與共產黨合作而已。

國民黨左右兩派的勢力可從改組初期的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各派人數作對比：國民黨左派有5人，共產黨3人，國民黨右派16人。若將中共黨員撥歸國民黨左

派陣營計，則國民黨左右兩派人數的比率為 1:2。可見當時右派勢力較左派強。須知，中共黨員控制了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大多數部門，但在軍隊中沒有影響力。孫中山用個人的影響力緩和兩派的鬥爭，防止其惡化。隨著孫中山於 1925 年 3 月逝世，兩派鬥爭越發激烈，國民黨左派勢力上升。

孫中山逝世與國民黨左派勢力的上升 (1925 年 3 月—1926 年 3 月)

孫中山死後，國民黨左右兩派對「三民主義」的闡釋出現了分歧。在「民族主義」方面，左派認為應該策動群眾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國內支持者，右派認為要恢復過去光榮傳統。「民權主義」方面，左派強調「憲政」，右派強調「訓政」。而「民生主義」方面，左派強調它是孫中山制訂之「平均地權、節約資本」政策，右派則認為孫中山所說的「民生主義」是「民生史觀」，不是什麼具體政策。

權力鬥爭也激烈。由誰來繼承孫中山的領導地位呢？當時在廣州，有五個有力競爭者。其中胡漢民為右派領袖、廣東省長、代理大元帥；汪精衛、廖仲愷都是左派領袖；許崇智是粵軍統領；蔣介石是黃埔軍校校長，國民黨黨軍的領袖。

1925 年 7 月 1 日，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在此說明，一般所說的國民政府是指 1927 年 4 月 18 日蔣介石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而 1925 年 7 月到 1927 年 4 月的這一段歷史，可說是蔣介石「起家」之歷史，在國民黨史籍甚至一般教科書中並不強調。其實，國民政府在 1925 年已成立。

當時國民黨左派已控制了國民政府。左派領袖汪精衛、廖仲愷分別被任命為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以及廣東省長、財政部長、工人部部長。右派領袖胡漢民則只獲委任為外交部長，深感不滿。況且，廣州國民政府未被列強承認，其外交部長一職形同虛設，無怪右派怒氣衝天，矛頭直指汪、廖二人。

1925 年 8 月，廖仲愷被刺。國民政府立即成立「特別委員會」，由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進行調查，得出結論是廖被右派刺殺。「特別委員會」認為胡漢民對廖被殺一事雖沒有法律上的責任，但應負政治上的責任，結果被派去莫斯科。國民黨右派受嚴重打擊。一部分右派成員於 1925 年 11 月在北京附近西山召開會議，形成「西山派」。他們

宣稱由汪精衛領導的廣州國民政府不合法，但沒有攻擊蔣介石。

蔣介石又於 1925 年 9 月指控許崇智濫用公帑，並勾結陳炯明，把許放逐到上海。到 1925 年底，廣州國民政府的重量級政治人物祇有汪精衛、蔣介石二人。

1926 年 1 月，國民黨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比左右兩派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的人數，國民黨左派 13 人，共產黨 7 人，國民黨右派 16 人。若將中共黨員撥歸國民黨左派陣營計，則左右兩派人數比率為 5:4。左派的勢力明顯加強。

「中山艦事件」(1926 年 3 月 20 日) 與蔣介石的崛起

1926 年 3 月 20 日，蔣介石逮捕具中共黨員身份的中山艦艦長李之龍，並宣布戒嚴，監視蘇俄軍事顧問住宅，史稱「中山艦事件」或「三月二十日之變」。

對於「中山艦事件」的起因，至今有不同說法。蔣介石認為共產黨密謀要把他擄去莫斯科。而共產黨相信整個事件是蔣介石虛構出來的，目的是蔣想找藉口清算中共。國民黨右派則說是中共與蘇俄顧問合謀策劃搞掉蔣。國民黨左派又有不同說法，認為是右派挑撥離間，使蔣相信汪會對他不和。其中左派成員陳公博在其回憶錄《苦笑錄》中有具體的述說。

「中山艦事件」使得汪精衛逃去歐洲，可見汪的一個弱點：不能積極地解決問題。這使他更加地可疑。最終，蔣介石成為廣州國民政府中權力最大的一個人物。國民黨左右兩派鬥爭，其結果是：鷸蚌相爭，漁人得利。

值得指出的是，「中山艦事件」發生後，陳獨秀向第三國際反映他主張兩黨在平等的關係上合作——即改「黨內合作」為「黨外聯盟」，但並未得到接受。

北伐與國共分裂 (1926—1927 年)

蔣介石掌握權力後，發動北伐戰爭。陳獨秀反對北伐，認為它會帶來新的軍事獨裁，但他也只能接受第三國際的指使參與北伐。

為準備北伐，蔣介石在廣州預先徵稅開源，強迫廣東商人買公債。這使廣東的商人對他非常不滿。他又收買地方軍閥，將他們委任為北伐軍(即國民革命軍)軍長。情況如

下：黃埔黨軍作為第一軍，其軍長為何應欽；第二軍湘軍，其軍長為譚延闓；第三軍滇軍，其軍長為朱培德；第四軍為粵軍，其軍長為李濟深；第五軍也是粵軍，李福林為軍長；第六軍是第二支湘軍，軍長是程潛；第七軍為桂軍，軍長由李宗仁擔任；唐生智則擔任第八軍——另一支湘軍的軍長。1926年6月，國民政府任命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7月，蔣誓師北伐。到1927年3月進駐上海時，國民革命軍已由最初的8個軍增至40個軍。

1926年7—9月，北伐軍集中討伐湖南、湖北的軍閥吳佩孚，並攻下長沙、漢陽、漢口、武昌。在湘一帶，由唐生智領軍，收了速戰速決之效。中共黨員隨軍北上，沿途策劃群眾運動，在農村組織農民協會清算地主，在城市組織工人搞罷工。國民黨左派座鎮武漢，為了遵守孫中山的「扶助農工」政策，支持由中共黨員領導的群眾運動。

蔣介石開闢另一戰場，轉戰江西。1926年9—11月，他討伐控制著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的軍閥孫傳芳，目的是為防止孫20萬大軍與吳佩孚會合。北伐最激烈的戰事發生在江西。蔣最終攻下南昌。孫傳芳戰敗後投東北軍閥張作霖。蔣介石則座鎮南昌。

到了1926年底，革命陣營中出現兩個權力中心：武漢與南昌。國民黨左派控制武漢，蔣介石控制南昌。雙方在重大問題上出現了分歧，重要分歧如下：一、有關下一步的軍事行動：是取北京還是取上海？二、有關「國民革命」的領導權：誰人應擁有最終決策權？三、有關社會革命：應鼓勵還是禁止？在這個問題上要注意到工人的罷工已直接影響生產，引發出許多問題。尤其是在武漢，外商正在將資金移往上海。四、有關反帝國主義運動：應該支持反帝還是維護外商在華利益？兩方在上述問題上持對立的觀點。

1927年3月，國民黨三中全會在漢口召開。當時左派沒有邀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蔣介石參加會議，又邀請汪精衛回國主持政局。汪於4月1日抵滬。蔣介石不願與武漢政府妥協。他在蘇浙一帶有較大影響力，於是決定攻取上海、南京。

要指出的是，當時蘇聯斯大林(Stalin)與托洛斯基(Trotsky)的鬥爭對北伐有很大影響。由於斯大林一直主張與蔣介石合作，即使對蔣有所懷疑，還是指令由中共領導的總

工會不要阻止蔣軍進駐上海。1927年3月，蔣介石輕易進駐上海。上海當時是商業中心，有大批外國僑民；蔣答應保護外國資產，防止了列強趁機干預。

進駐上海後，蔣以總工會與工商業聯合會的武力對抗為藉口展開「清黨」。從4月12到14日，「清黨」運動從上海不斷擴大到南京、杭州福州、廣州。其間發生了一系列流血事件，許多與中共有關聯的青年和學生被無辜殺害。「清黨」標誌著國共合作開始遭到破壞。國共合作尚未終結，因為當時共產黨仍得到武漢國民黨左派的支持。

1927年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與武漢國民政府對峙，史稱「寧漢分裂」。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解除了蔣介石一切職務，並把他開除出黨。

國民黨左派在武漢仍與共產黨合作，但由於工人罷工停產、資金流走、貿易停頓，武漢經濟幾乎陷於崩潰境況。這使得國民黨左派很快便出現困境。在湖南，共產黨又繼續領導農民清算地主。土地革命使不少北伐軍軍官的家鄉土地被農民協會沒收；軍隊不滿群眾運動，在長沙發生兵變。

而共產黨在武漢也陷入了困境。斯大林於6月1日發給中共一項指示：繼續與國民黨左派合作，但同時要主動建軍、直接進行土地革命。陳獨秀接到指示後，面對進退維谷的局面。他認為如要執行斯大林的指示，必須另起爐灶，即先停止與國民黨左派合作，但這樣做又顯然違反斯大林路線。他只好解釋說這些任務「不是即時都能實現的」。結果是第三國際批判陳獨秀犯了「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

蘇俄顧問羅易(M.N. Roy)把斯大林6月1日電文副本交給了汪精衛，使汪明白中共的目的是要在合作的架構內奪權。1927年7月15日，武漢「分共」。但「分共」與「清黨」的武力解決又不同，是以和平方式解決。另外汪精衛決定東征討蔣。共產黨員隨張發奎東征，賀龍、葉廷在南昌起義。汪精衛遂決定清洗共產黨。至此，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瓦解。眼見南京、武漢相繼與共產黨決裂，國民黨右派於是出面調停寧、漢之間的糾紛，最後上演一場「寧漢復合」。實際上，國民黨仍然內訌不已。蔣介石於8月下野，但又於1928年1月正式復職，主政南京國民政府。這解釋為何南京國民政府雖然成立於1927年4月18日，但史家皆以1928年1月為「南京十年」(the Nanjing Decade)的開端。

(三) 國共鬥爭 (1927—1937 年)

國共分裂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兩條革命路線

第三共產國際主張城市、工人革命，而毛澤東則主張農村、農民革命。在此需要提到的是，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受到兩方面的矛盾影響，其一是中共與國民黨的矛盾，另外是中共內部的矛盾。

由第三國際指導的城市、工人武裝鬥爭

國共分裂後，中共中央局書記瞿秋白、李立三忠實地執行第三國際的革命路線，但他們因領導起義失敗而相繼下臺。可說，他們是執行第三國際錯誤路線的代罪羔羊。

瞿秋白領導時期 (1927 年 8 月—1928 年春季)

瞿秋白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與當時蘇聯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的鬥爭有很大的關係。當時，斯大林與托洛斯基對「大革命」失敗後的形勢有不同意見。斯大林抱有較樂觀的看法，認為「大革命」失敗後「革命浪潮」仍將來臨；托洛斯基則相反地認為會出現無限期的「反革命形勢」。

瞿秋白接任中共中央局書記後，發現自己正面對非常嚴峻的局勢。南京、武漢已相繼反共，導致工人對中共失去了信心，大多傾向於加入國民黨組織的工會，藉以爭取經濟利益。斯大林則堅持中共搞政治罷工，強調追求經濟利益是走托洛斯基「改良主義」、「經濟主義」之路。

瞿的任務是去尋找「革命浪潮」。令人沮喪的是，當時只有農村呈現斯大林所說的「革命浪潮」，這是因為農民對交稅交租有強烈的抗議。故瞿秋白派毛澤東去策動農民起義。1927 年 9 月，毛澤東在湖南領導秋收起義，但以失敗告終。瞿秋白承認這次起義犯了策略上的錯誤，即沒有好好地把工人和農民聯繫起來，但他將責任全推在毛澤東身上。

斯大林很快又傳達新指示，囑咐瞿秋白注意國民黨軍隊在廣州一帶爭奪地盤。這正好展示「革命浪潮」已來臨；況且，廣東農民領袖彭湃在廣州附近建立了海陸豐蘇維埃政權，正好讓工人與農民聯合起來。瞿秋白遂依照指示，於 1927 年 12 月發動廣州起義，但三天便被鎮壓下去。

起義失敗，瞿秋白下臺，被指責犯了「『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蘇聯方面，布哈林(Bukharin)得重新詮釋「革命浪潮」理論，以示斯大林並沒有犯錯。他說，當時的革命形勢只處於兩個「革命浪潮」之間的凹處(trough)，策動起義的時機還未成熟。

李立三領導時期 (1928 年夏季—1930 年秋季)

李立三當上中共中央局書記後，面臨同樣艱巨的任務：繼續尋找斯大林所說的「革命浪潮」。當時上海雖有工潮，但全都是以爭取經濟利益為目的，並由國民黨工會領導。李立三明白，不發動武裝起義便會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一旦發動起義而失敗，便會犯「『左』傾盲動主義」錯誤。

1929 年，蔣介石與地方軍閥矛盾激化，第三國際於是通知李立三充分準備「革命浪潮」的來臨（即革命形勢不再處於兩個「革命浪潮」之間的凹處）。1930 年爆發中原大戰，蔣從湖南調軍北上。7 月，李立三乘機發動長沙起義，但失敗。

黨內也出現分裂。剛好回到中國的「國際派」（亦被稱為「留學生幫」或「二十八个布爾什維克」）對李立三展開猛烈抨擊。他們包括王明（陳紹禹）、博古（秦邦憲）、張聞天等人，是 1926—1930 年間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留學生。由於他們找不出所謂「李立三路線」與第三國際路線有基本上的差異，只好由他們的老師米夫(Pavel Mif)對「革命浪潮」理論再次進行詮釋。他說道，「革命浪潮」(pod'em)不等於「直接革命形勢」，而只有「直接革命形勢」才是發動革命的最佳時刻。李立三因犯「『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而下臺。

「國際派」領導時期 (1931—1934 年)

「國際派」堅決執行第三國際的城市革命路線。他們搞政治性罷工，失去更多工人

的支持；又採用公開式鬥爭，以致組織機關被國民黨逐一殲滅。1933 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被迫撤出上海，遷到江西蘇維埃根據地的首都瑞金，激化了「國際派」與毛澤東之間的矛盾和鬥爭（詳情參看下節）。

由毛澤東領導的農村、農民武裝鬥爭

從開闢井岡山根據地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誕生（1927 年 11 月—1931 年 11 月）

1928 年 4 月，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餘部與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於井岡山會合；6 月，成立紅四軍。1929 年 1 月，毛、朱率領紅四軍主力到贛南、閩西建立新的根據地。1930 年，中國已出現了 15 個根據地（蘇維埃）。只有毛澤東組了軍隊，故有「實力（權）派」之稱。7 月，李立三借助紅軍攻打長沙，失敗後想以紅軍攻打武漢，但毛不聽命。

毛澤東就在此時確立他的革命理論。其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武裝奪取政權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這是因為中國沒有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沒法經過長期合法鬥爭以積蓄力量，只能首先在局部地區建立革命政權，然後在一個長時間裏逐部地、波浪式地把這種政權推向全國。

第二，武裝奪取政權應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這是因為鄉村是反革命力量比較弱的地方，又可以在脫離城市的條件下相當獨立地存在下去。

第三，走武裝奪取政權、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必須有一個革命政黨和一支人民軍隊。黨是整個鬥爭的組織者和領導者；軍隊有「三大任務」：打仗、做群眾工作、籌款。

第四，軍隊和黨的關係必須建立在「黨指揮槍」的原則上。1929 年 12 月的古田會議批判了「純粹軍事觀點」，指出「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是中共建黨、建軍的里程碑。

第五，革命要摒棄「教條主義」，必須從實際出發、作實際調查。毛說：「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他於 1930 年 5 月寫〈反對本本主義〉，目的是批評盲目執行第三國際指示的中共中央局領導人。

第六，革命要得到廣大群眾的支持。毛澤東從井岡山推行激烈土地政策失敗取得了

教訓，決定縮少打擊面以爭取最廣大群眾的支持。根據地的土地革命路線是：「依靠貧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消滅地主階級」。他在這個時期奠定了日後「群眾路線」的基礎。

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有國內學者稱這一發展為「新的啓蒙運動」。

1930年10月，中原大戰完畢，蔣介石集中兵力對付共產黨。從1930年12月到1931年7月，蔣發動了三次「圍剿」。而毛澤東則制訂了反「圍剿」戰略戰術。毛認為，敵人人數及武備都比自己優勝，不能打陣地戰。反「圍剿」的戰略戰術可概括為：「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先打弱敵」、「避敵主力」、「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毛澤東的聲譽隨著反「圍剿」的勝利而上升。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工農兵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各根據地的610個代表參加了這次大會，毛澤東當選共和國主席。會上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勞動法》、《土地法》。

這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發展時期。毛澤東不只建立了一套基於中國實際的革命理論，還在建設根據地的過程中把一向流離於政治外的廣大農民納入政治體系之中，因而創立了一套自下而上、全民政治動員、全面社會整合的發展模式，與國民黨當時推行的一套分庭抗禮。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困境與覆亡 (1931年11月—1934年10月)

削弱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內部鬥爭不斷。「國際派」得到米夫(Pavel Mif)在背後支持，強烈攻擊毛澤東。他們批評毛不打擊富農是走「富農路線」，是「右傾機會主義」；又批評紅軍不是一支真正的工農紅軍，沒有脫離「游擊主義」的傳統。

「九一八事變」後，瑞金政府於1932年4月發出《對日宣戰通電》，並提出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任務。但「國際派」認為日本侵略中國東北「是最露骨的反蘇聯戰爭的序幕」，並提出要「武裝保衛蘇聯」。

蔣介石於 1932 年 6 月與日本達成妥協後便發動第四次「圍剿」。湖南、湖北、安徽各根據地相繼失守，中共在華中的勢力被迫向西撤退。1932 年 10 月，寧都會議召開，毛澤東挨批。其「誘敵深入」戰略方針被指責為「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值得注意的是，代表第三國際主持這次會議的是周恩來，因此他在此次批評中擔當了重要的角色，這件事對他與毛往後的關係有重大影響。會議撤銷了毛的紅軍總政委職務。1933 年初，蔣調集 50 萬兵力圍攻江西蘇維埃。周恩來、朱德指揮反「圍剿」，並取得成功。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這個關鍵時刻遷入瑞金，進一步激化中共黨內鬥爭。1933 年 6 月，「國際派」開展「查田運動」，改變了毛澤東推行的溫和土地政策。富農只分得較差的土地，甚至被劃為地主；不少中農被劃為富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覆亡後，「國際派」被批判推行極「左」路線，破壞了農村的群眾基礎。

1933 年 9 月，蔣介石發動第五次「圍剿」。他在南昌對部下訓話時說：日本不過是「皮膚小病」，共產黨才是「心腹之患」。蔣的新戰略是「步步為營，堡壘推進」。他因此集中 100 萬軍隊，動用 200 架飛機，築起了 2,900 座碉堡，重重包圍瑞金。毛澤東此時已失勢。負責保衛江西蘇維埃的主要是蘇聯軍事顧問李德(Otto Braun)。他與「國際派」把紅軍「正規化」，並主張「全線出擊」、「禦敵於國門之外」、打「陣地戰」。

「國際派」還把蔡廷鍇與蔣光鼐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1933 年 11 月—1934 年 1 月）看成是國民黨的把戲，認為它與國民黨反革命資產階級政府沒有任何區別，拒絕援助合作。結果，福建人民政府垮臺，而中共也失去一次突破「圍剿」的機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最終在 1934 年 10 月覆亡。

1934 年 10 月，紅軍開始長征，到 1935 年 10 月，在陝北延安一帶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據地。長征有 10 萬人參加，到陝北時毛的部隊剩下 8,000 人；其後會合的加起來約 3 萬。期間，1935 年 1 月開了遵義會議，毛澤東在政治上翻了身，但還是周恩來的副手。

中共撤到陝北後，蔣介石還是窮追猛打，直到 1936 年 12 月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才停止內戰，並奠定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基礎。

(四) 第二次國共合作 (1937—1945 年)

國民政府在八年抗日戰爭中的處境

蔣介石的抗日戰略：打「持久戰」、「消耗戰」

蔣介石認為對付日本大舉入侵的最佳方法是打「持久戰」、「消耗戰」。他明白日本沒有足夠能力長期佔領幅員遼闊的中國；只要他能撤入及堅守西部，必然取得最後勝利。現介紹抗日戰爭的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 1937 年 7 月起到 1938 年底止，是國民政府逐步撤入四川的時期。戰爭爆發後，華北很快淪陷。日本若派軍隊沿(北)平漢(口)或(天)津浦(口)鐵路南下，蔣介石便無法實施「以空間換取時間」(trading space for time)的戰略。幸好日本最後決定在華東開闢新戰場，目的是要摧毀蔣的經濟基地，以收速戰速決之效。蔣遂派最精銳的部隊到上海、南京一帶攔阻日軍，爭取時間撤到武漢；期後又派大軍與日軍交戰於黃河以北及津浦鐵路一帶，以爭取更多時間撤到重慶。(註：上海、南京、武漢分別於 1937 年 11 月、12 月，以及 1938 年 10 月棄守。)在這個階段，蔣失去最精銳、最忠誠的部隊。中共亦趁機在廣大的農村腹地建立起抗日根據地。

第二個階段從 1939 年起到 1945 年 8 月止，是國民黨中央軍與日軍對峙僵持的時期。蔣介石乘機派軍隊去封鎖中共的西北根據地。1941 年 1 月，中共新四軍與國民黨第四十師發生大規模衝突（史稱「新四軍事件」或「皖南事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宣告破產。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介入遠東戰場，成立中緬印戰場指揮總部，以蔣為最高統帥。

在這階段，日軍佔領著「點」、「線」，加強對佔領區的控制(包括於 1940 年 3 月成立南京汪偽傀儡政權)，轟炸和封鎖國統區，又對中共建立在「面」的根據地展開「掃蕩戰」，嚴重削減中共的勢力。1944 年 5—12 月，日軍再次發動針對中央軍的強大攻勢，稱為「一號作戰」(Operation Ichigo)，亦即豫湘桂戰役。中共因此獲得喘息機會，得以重建根據地。而國民黨也因國統區面對的困境無暇顧及中共勢力的再次擴張。(註：「點」、「線」、「面」是軍事用語。「點」即沿鐵路的市鎮，「線」即鐵路，而「面」是指

廣大的農村腹地。)

國統區面對的困境與重慶國民政府的對策

在國統區，國民政府面臨一系列嚴重問題，也作出各種對策。

首先是糧食短缺。四川雖是產米省分，但由於大量難民湧入國統區，再加上華中產米區淪陷、日本實施經濟封鎖，故產生嚴重的糧食短缺問題。政府的對策是禁植罌粟以及推廣穀物栽植。1940年旱災失收，投機活動導致通貨膨脹。政府遂將田賦劃為國稅，徵收實物，並施行糧食配給政策。

財政拮据是另一嚴重問題。日本開戰後，政府支出大增，收入則大減。撤入重慶後，軍隊人數大增，從1940年的250萬增到1941年的450萬，1944年又增加到570萬。田賦劃為國稅後，行政費又大增。儘管政府提高稅率、開徵新稅、發國債、借外債，仍未能扭轉入不敷支的局面。政府終於採用濫發紙幣的方法去解決問題，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受薪階級影響最大。

另外，傳統農業經濟基礎不足以支援打「持久戰」。政府對策是發展工業。戰爭初期，大量工廠、機器、技工遷入內地。政府亦大力鼓勵私人投資。國統區的工業年均增長率為27%。工業發達的原因包括：戰時軍需品需求大增、日本實施封鎖消滅了競爭對手、大量廉價勞工從敵佔區湧入、政府銀行提供低息貸款。但必須指出，國統區內國營工業佔工業總產值80%，而國營工業中最發達的當然是國防工業。

中日戰爭對國民政府的影響

總體來說，中日戰爭對國民政府有極大的負面影響：

第一，軍力衰竭。國民政府在戰爭早期已失去其最精銳的部隊。中後期雖然擴軍，但軍隊的素質和士氣則大不如前。

第二，政府官員士氣日益衰落，政府內部也更趨分裂。1938年成立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亦批評政府的不是。1944年，部分國民黨黨員推行「革新運動」，以表達其對政府的不滿。

第三，農民不滿情緒高漲。這是因為國民政府的權力未達基層，要依賴地方傳統勢力管治農村，以致農民怨聲載道。

第四，通貨膨脹日益嚴重。通貨膨脹雖是一個經濟現象，但帶來嚴重的政治後果，尤導致貪污成風。

第五，中共有了擴大的機會(詳情參看下節)，直接影響國共兩方的力量對比。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在八年抗日戰爭中的發展

抗日戰爭期間中共勢力的消長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在八年抗日戰爭中有很大發展。中日戰爭爆發時，中共只控制陝北的一部分，黨員及紅軍只有數萬人。到戰爭結束，黨員及紅軍已增至 100 萬人。可說，八年抗戰是國共鬥爭的一個轉折點。不過，在這八年中，中共的勢力並非持續擴張。現分三個階段說明。

第一個階段從 1937 年 7 月起到 1938 年底止，是國民黨中央軍與日軍正面交鋒的時期，也是中共開闢抗日根據地、迅速發展的時期。由於國民政府撤入四川，日軍又只能佔據「點」與「線」，故中共能在敵後廣大的農村腹地(「面」)建立起抗日根據地，主要在華北地區。須知，中共不是控制一個個完整的根據地，而是根據地範圍內的若干分散地帶而已。每個根據地可分為「鞏固地帶」、「半鞏固地帶」、「游擊地帶」。中共只能在「鞏固地帶」內建立起政權。一般地圖所顯示的根據地實在誇大了中共在這階段的勢力範圍。中央根據地(即陝甘寧邊區政府的所在地)是唯一一個最鞏固的根據地。

第二個階段從 1939 年起到 1943 年底止，是抗日根據地面臨困難、嚴重萎縮的時期。國民政府撤入四川後，日本集中兵力對付中共，在華北進行「掃蕩戰」及實施「三光政策」，即「殺光、燒光、搶光」。1940 年 8 月，中共發動「百團大戰」還擊，卻招來更大規模的報復作戰。「掃蕩戰」令中共失去近一半的根據地。中共又要同時應付中央軍的封鎖。1941 年 1 月更發生「新四軍事件」(見上文)，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名存實亡。

1942—1943 年間，中共為爭取生存空間推行一系列新政策，主要以「運動」方式

進行：

第一，在組織方面，推行「整風運動」、「審查幹部運動」、「精兵簡政」。「整風運動」批評「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三股歪風。所謂「主觀主義」，是指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及以周恩來為代表的「經驗主義」。「整風」是思想上的清黨；「審幹」是組織上的清黨。由此，毛澤東真正樹立起他的領導地位。

第二，在政治方面，推行「三三制」，即政府機關由共產黨員、非黨的進步人士、中間派人士組成。

第三，在思想、教育方面，推行「下鄉運動」、「時事教育」。

第四，在經濟方面，推行「大生產運動」、「減租減息運動」、「互助合作運動」。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政策、運動基本上在中央根據地推行。

第三個階段從 1944 年起到 1945 年 8 月戰爭結束止，是抗日根據地再度擴張的時期。由於日本決定要摧毀美軍在中國的轟炸機基地，故在 1944 年 5—12 月期間向中央軍發動自 1938 年以來最強大的攻勢，稱為「一號作戰」(Operation Ichigo)，導致國民政府損失 50 萬士兵。中共趁機再度擴張勢力。在中日戰爭的最後一年，始見陝甘寧邊區於 1942—1943 年間所推行的政策在其他根據地試行。到戰爭結束時，中共控制華北、華中、華南共 16 個根據地，人口合計 9,000 萬。

解釋戰時中共勢力擴張的原因：評價西方史學界中三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

首先看看 Chalmers A. Johnson (查默斯·約翰遜) 所著的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他的觀點是中共利用日軍暴行所喚起的「農民民族主義」(peasant nationalism) 而取得廣泛的支持；它所領導的是一場「民族主義運動」(a nationalist movement)。問題是，為什麼大部分抗日根據地並非建立在日軍暴行最猖獗的地區？最鞏固的根據地是陝甘寧邊區政府的所在地，這是日軍從未猖獗過的地區。

另一位學者 Mark Selden (馬克·塞爾登) 在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中提出與中共本身相同的說法：中共實

行「群眾路線」(the mass line)而取得廣泛的支持；它所領導的是一場「社會革命」(a social revolution)。在此提出疑問，作者所稱的「延安道路」(the Yenan way)是否體現於各抗日根據地？其實，「延安道路」基本上反映中央根據地的革命經驗；直到戰爭結束前的一年，始見它在其他根據地試行。

另一種觀點見於 Ralph Thaxton(拉爾夫·撒克斯頓)所著的 *China Turned Rightside Up: Revolutionary Legitimacy in the Peasant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首先，Thaxton 把中國的傳統區分為「大傳統」(the Great Tradition)與「小傳統」(the Little Tradition)：「大傳統」體現於士人的儒家文化 (the literati Confucian culture)；「小傳統」則體現於庶民(老百姓)的文化(the folk culture)。他進一步指出，中共以順應「小傳統」作為其制定政策的基本考慮而取得廣泛的支持；革命並非傳統的否定，而是傳統的肯定。問題是，中共是否無條件地順應農民的「小傳統」？答案是否定的。儘管中共的政策以農民的利益為依歸，但它絕不會在原則方面讓步。譬如，華北農民想消滅地主階級，但由於中共正在致力組織包括地主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農民最終被勸服暫時放下階級仇恨，接受黨的「減租減息」政策。

要注意的是，Johnson 與 Selden 的觀點雖然不同，但二人皆強調中共在抗日戰爭中所擔當的先鋒角色 (vanguard role)。無論中共是領導一場「民族主義運動」(這是 Johnson 的觀點) 或者是領導一場「社會革命」(這是 Selden 的觀點)，其結果是促進「農民的政治化」(the politicization of the peasants)。在這方面，Thaxton 的意見與 Johnson 及 Selden 的意見恰好相反。中共迎合「小傳統」(這是 Thaxton 的觀點)，其結果是促進「政治的庶民化」(the folklorization of politics)而非「農民的政治化」。上述三人對中共在戰時的擴張可說具獨特的見解，但各人的論點也有不足之處。

無可否認，中共領導抗日民族主義運動相當成功。它實施「統一戰線」策略，推行較溫和的土地政策，縮小打擊面，故能爭取到廣泛的支持。不過，民族主義並非導致中共勢力擴張的唯一因素。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實取決於地形和軍事因素。但根據地一旦建立，其成功與否則取決於領導的素質和政策的成效。我們該承認中共在組織群眾運動方面的努力及成就。

從現代化的角度而言，八年抗戰對中國現代化帶來了沉重的打擊。戰前所建立的現代化產業部門幾乎全被摧毀。國民政府在戰時建立的統制經濟體系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西部地區的現代化發展，但同時造成了官僚資本和國家資本主義的畸形發展，又帶來了通貨膨脹的惡性循環。另一方面，共產黨在其根據地(主要是陝甘寧邊區)推行了一套動員各階級(層)、全面整合社會的發展模式，為日後現代化範式的轉換奠下基礎。

(五) 國共內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1946—1949 年)

抗戰勝利，中國獲得自 1895 年以來最好的一次現代化發展契機。這麼說是因為戰後出現了一個寬鬆的國際環境，以及有利於現代化發展的新因素。後者包括：民族主義高漲，有助社會的整合；民眾參與意識高漲，體現於輿論議政和政黨組織(如走「第三條道路」的近百個政黨)的湧現。可惜，中國很快便爆發內戰，失去了這個契機。

戰爭結束後，國共雙方都爭先到達敵佔區接受日本投降，並接收大量軍備武器。中共佔到地利，但蔣介石得到美國援助，把國民黨部隊空運和海運到淪陷區。國民政府因此在這個回合中取得了勝利。

1945 年 8—10 月，國共兩方在重慶進行和談。國共和談的主要障礙，是國民政府要求中共在成立聯合政府之前交出軍隊，而中共則堅持這只能發生在聯合政府成立之後。1945 年 12 月到 1946 年 3 月，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來到中國斡旋國共問題。期間國共兩方雖然達成停火協議，並在停火期間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但停火協定與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只是一紙空文。馬歇爾一走，和談便宣告失敗。1946 年 7 月，中國爆發全面內戰。

全面內戰 (1946 年 7 月—1949 年)

國民黨軍隊的潰敗

1946 年 7 月到 1947 年 6 月，國民黨軍隊發動全面攻勢，而中共則採取全面退卻的戰略。1947 年 3 月，中共放棄延安。蔣介石為了收復東北，把供給線拉得太長了，只

能守著「點」和「線」，四面被共軍包圍。偽滿洲的 300,000 部隊被解散後，轉投共方。

1947 年 7 月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面反攻，而國民黨軍隊就節節敗退。三大戰役——遼瀋戰役(1948 年 9—11 月)、淮海戰役(1948 年 11 月—1949 年 1 月)、平津戰役(1948 年 12 月—1949 年 1 月)是國共內戰的轉折點。1949 年 1 月，北平失守，蔣介石辭職，李宗仁任代總統。中共至此已座擁長江以北半壁江山。4 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向各方迅猛推進。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國民政府的崩潰

內戰期間，國民政府除了在戰場上兵敗如山倒外，在施政方面亦大失民心，連一向支持它的人也心灰意冷。

明顯的一個問題是通貨膨脹失控，具體情況可見於下表數字：

<u>年/月</u>	<u>法幣(元)：美元</u>	<u>物價指數 (1937 年=100)</u>
1940	20 : 1	
1945/12	3,500 : 1	160,000
1946/12	6,500 : 1	600,000
1947/12	75,000 : 1	10,000,000
1948/5	2,000,000 : 1	
1948/6	4,000,000 : 1	
1948/7	8,000,000 : 1	
1948/8	11,000,000 : 1	280,000,000

內戰初期，蔣介石還狡辯說通貨膨脹只是共產黨的宣傳把戲。到 1948 年 8 月，失控的財政形勢迫使國民政府決定放棄舊的法幣，改發行新的金圓券，匯率定為 3,000,000 法幣兌換 1 金圓券。可惜，金圓券無法奏效。到 1949 年 4 月，金圓券的發存量已增加了 4,500 倍，通貨膨脹再次失控。受害最深的，當然是收入固定的受薪階級，包括：工人、職員、教師，甚至一般政府公務員。總之，物價飆漲嚴重毀壞國民的生計，又徹底破壞政府的信譽。

資源短缺又激化貪污。部分高級官員更挪用美國提供的援助大量收購工廠企業，使他們擁有全國工業資產的 70—80%，變成了「官僚資產階級」。

至於「民族資產階級」（即一般工業家、企業家、商人），他們對國民政府越來越感到失望和不滿。戰後，中國的貿易變得越來越依賴美國市場。1946年11月，國民政府又與美國簽署《中美友好航海通商條約》，實際上協助美國將其戰時生產過剩的物資向中國平價傾銷。這直接打擊中國的民族工業，只有買辦得益。

知識分子和學生亦深感不滿。國民政府在內戰期間變得更加專制。1946年12月通過新憲法，把更多權力交給蔣介石。1947年5月，上海爆發了由學生領導的「反饑餓」、「反迫害」運動（有人稱之為「新五四運動」）。政府以強硬手法回應，竟將罷工、罷課、示威，以及多過十人的請願定為非法活動。運動因此擴大而變成一場保衛公民權益運動。1948年4月，美國向國民政府提供一筆4億美元的資助，但要求國府與日本和好。5月，公民運動再演變成為一場反美運動。

可見社會上一般人都對國民政府失去了信心。

誰丟失了中國？

1949年後，很多人揶揄蔣介石，說是他丟失了中國(the man who lost China)。這個批評合理嗎？先看看蔣甚麼說。

蔣介石的証言/自辯

蔣介石在大陸最後掙扎的日子裏，坦率地承認了其政權的種種弊端。他對國民黨、軍隊、政府機構內部的積弱，作出了嚴厲的批評。研究蔣介石的專家指出，蔣對下屬的批評一向切中要害，並不會無的放矢。

1947年6月，即在中共反攻的前夕，蔣還表示有信心。他說：「無論就哪一方面看，我們都佔有絕對的優勢：軍隊的裝備，作戰技術或經驗，共軍不如我們，至於軍需補給，如糧食彈藥等，我們也比匪軍豐富十倍。」

到1948年1月，蔣又說：「物質上我們有很好的裝備，有很精良的武器，可以說具備了一切勝利的條件。……但是，我們勦匪為什麼還要遭受挫折，遭受損失呢？」

蔣介石認為軍官表現差勁是主要問題。以下是蔣對其屬下軍官的批評：

第一，他們缺乏軍事學識和專業技能(「打糊塗仗」)；

第二，他們對屬下士兵不聞不問，還侵吞軍餉(「士兵不叛變，不逃跑已算很好」)；

第三，他們「精神疏懈，道德低落」；

第四，他們不能彼此合作(「大家都養成了自保自足的惡習，只看到自己的一部的利益，對於友軍的危難，整個戰爭的成敗，幾乎是漠不相關。」)；

第五，他們邀功爭寵，推卸責任(「如果我們打了敗仗，就彼此怨恨，互相攻訐，將自己的過失，盡量掩護，將打敗的責任，推得乾乾淨淨。」「勝利卻爭功爭賞。」)；

第六，他們虛報及不聽命令。

蔣介石又對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作出嚴厲的批評：

「老實說，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黨都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頹唐腐敗；也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的沒有精神，沒有紀律，更沒有是非標準，這樣的黨早就應該被消滅被淘汰了。」

「我們黨和團沒有基層組織，沒有新生的細胞，黨員和團員在群眾間發生不了作用，整個黨的生存，差不多完全寄託在有形的武力上，這是我們真正的危機，也是我唯一的憂愁。」

1949年，眼看敗局已定，蔣悲痛地說：「軍事和政府部門對過去的失敗都負有責任。但是最主要的責任，這一點不能否認，是因為黨的癱瘓，黨員、黨的組織機構和黨的領導方式問題重重。因此，黨成了行屍走肉，政府和軍隊也就喪魂失魄，結果是軍隊崩敗，社會動亂。」

「今天，我痛心地指出，從抗戰後期到現在，我們革命軍隊中表現出的貪污腐敗，真是無奇不有，簡直難以想像。……這樣的軍隊就不能不走向失敗。」

(此節引文錄自[美國]易勞逸 Lloyd Eastman 著，王建朗、王賢知譯：《蔣介石與蔣經國，1937—1949》，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9年。原書名《毀滅的種子》*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難道蔣介石沒有責任？

從蔣介石的証言可得悉，他把國民政府垮臺的責任全推在下屬身上。他苛責下屬是絕對有理由的，因為他們的表現確實令他太失望和痛心了。其實蔣也難辭其咎，因為維護他個人權力的整套制度，是完全缺乏問責性(accountability)的。這正好解釋為何在他保護傘下工作的人員變得如此貪污腐敗和不得人心。

還須指出，有人認為蔣介石丟失了中國這個說法並不能成立。原因是蔣未嘗真正擁有過中國(Chiang Kai-shek (Jiang Jieshi) never had China in the first place)，故怎麼會說他丟失了他從未擁有過的東西呢？事實是否如此，可謂見仁見智。

蔣介石為何不撤掉失職、貪污的部下？

美國「飛虎隊」司令陳納德將軍(General C.L. Chennault) 曾詢問蔣介石為何他不把所有失職、貪污的部下撤掉。蔣講了兩句話就走了。蔣夫人替蔣作翻譯說：「他【蔣介石】說能夠與他同事的也就是這些人了，如果我們把他們都罷免，那誰留下來幹事呢？」

結論

可以說 1949 年國民政府垮臺，主要是由於其自身倒行逆施，使整個機體變得腐朽所造成的。戰後的國民政府已變得像一所結構上出了問題的房子，遇到暴風雨便自然倒塌下來。

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於 1949 年 2 月 5 日所講的一番話，正好支持上述觀點。他說道：「戰後，尤其是去年下半年，我們親眼目睹了傳統型的中國政府體制的衰敗和末落。……至於蔣介石本人，他無疑為人正直，富有獻身精神，但其觀念和手段，仍是非民主的。政府也不乏正直、自由人士，但體制則滋生培育著罪惡，並進而導致自身的毀滅。它變得如此的腐敗無能，如此的不得人心，以致哪怕是任何自身的有序改革都少有希望，即使沒有共產主義運動，恐怕也會爆發出另一場革命。」

在此引用《孟子·離婁》的三句話來為 1949 年國民政府垮臺作總結：「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以下是 James Legge(理雅

各)的翻譯：

“A man must first despise himself, and then others will despise him,

A family must first destroy itself, and then others will destroy it.

A kingdom must first smite itself, and then others will smite it.”